



2009年10月14日第24期

总第三十四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史林一页

[余汝信](#)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

[晓明](#) 19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

蓦然回首

[马文蔚](#)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一）：风暴骤起

[不平](#) 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

文革遗产研究

[顾土](#) 自我否定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四

闲读偶记

[胡庄子](#) 两位主席夫人与一个椰子的故事

故纸堆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简讯

[舟人](#) 苏联外交官回忆录披露“九一三”事件新细节

【史林一叶】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

余汝信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后

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的简报”（《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一版第 247 页）。这个在批判林彪时曾遭到猛烈批判的“反革命的简报”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许多人并不清楚。

一、吴德对简报签发过程的回忆

关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华北组讨论的情况以及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当事人（签发人）之一的吴德生前曾回忆道：“8 月 24 日下午的华北组讨论会，陈伯达迫不及待首先发言，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非常重要，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讲了一通‘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并闪烁其词地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并且说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6-117 页）。

对于陈伯达的发言，吴德回忆明显有不准确处。陈的发言并没有涉及国家主席问题。“手舞足蹈”一段话，是汪东兴发言谈及国家主席问题时陈的插话，并不是陈自己发言中的话。

吴德接着又说：“汪东兴跟着讲了话，主要的意思是设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他也讲了有人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同上）。对于汪的发言，吴的回忆倒是基本准确。

关于简报的签发过程，吴德称：“晚上 11 点多钟时，我和李雪峰、解学恭吃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在华北组的简报组，他参加了整理简报的工作，他把整理好的简报稿子拿来送审。简报的内容就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简报中并没有陈、汪发言的内容而是称陈、汪的“重要发言（另有简报）”。解学恭拿着稿子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我没有参加会，发言的具体情况也不了解，我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这样，我也就

在要付印的简报稿子上签了个‘吴’字”。“我们签完字后，简报就送中央办公厅了，很快印好就发了。这个简报就是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全会的第6号简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117—118页）。

这样，我们知道了，简报的签发人是李雪峰、吴德（可能还有解学恭），李、吴、解都不是以后官方认定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之前又称“林陈反党集团”）成员（李曾经被认定是，文革后又说不是了）。

二、林彪讲话与陈、汪发言的拥护者

第六号简报说：“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简报列举出参加讨论的发言者有：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及陈毅。

这些人当时的职务——

刘锡昌：原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郑维山：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

郭玉峰：原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

聂元梓：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时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刘子厚：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马福全：原石家庄3302厂工人，时任石家庄市革委会副主任；

钱学森：原七机部副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邝任农：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

吴涛：时任内蒙古军区政委，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吴忠：原陆军第四十军军长，时任北京市卫戍区司令员；

尤太忠：原陆军第二十七军军长，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彭绍辉：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

陈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他们均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这些人当中，调子最高者，如钱学森。简报称，“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陈毅的调子据说也不低，可惜他当时被视为“右”的代表，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他的外交部长一职，1970年6月已被姬鹏飞所“代理”），简报势利地没有引述他尖锐的发言，可见当时发言能上简报是件光彩的事，同时也不是那么容易上的。

同样地，发言者中除陈伯达外，并没有以后官方认定的“林彪反党集团”（之前又称“林陈反党集团”）的成员（郑维山、刘子厚曾经被认定“上贼船”，以后解脱了）。

文革后，发言高调者，如陈毅，仍被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钱学森，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即便“上了贼船”的郑维山，亦重任大军区司令员。官方说，他们只是曾经受了蒙蔽而已。

三、“华北组最激烈”

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按大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官修《毛泽东传》声称：“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4页）。所谓最激烈，不外是最为群情汹涌，慷慨激昂。体现在简报中即为以下段落：“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这些话语，足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惊恐不安，也使毛泽东立即下大决心使全会的形势发生逆转。

《毛泽东传》还称：“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揪人’”（同上）。

诚然，陈，吴、叶、李、邱的发言，矛头一致指向了张春桥，却都没有“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内容。“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指责他们“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不过就是向张春桥发动了攻击。《罪证》引述的陈伯达的发言称：“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叶群称：“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称：“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李作鹏称：“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称：“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陈、叶、吴、李、邱的发言节录，见《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一九七二年七月，9-13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反对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没有其他的理论武器，也

不可能拿起其他的理论武器。只得站在比他更左的方位，以其反对毛、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为借口。这是今天很多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理解的。惟五年以后的那一场欢欣鼓舞的胜利表明，打倒张春桥一类极左派，是历史前进的正途，是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并不是什么罪行。如果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打张的中央委员们有什么错，只是错在选择了这么一个发难的时机。

众所周知，九届二中全会结束，首先倒霉的是参与华北组活动的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在华北组反张及鼓动设国家主席最积极的汪东兴，很容易就检讨过关；而受汪误导选择了在一个错误的时机联合汪一起向张春桥发起攻击的叶、吴、李、邱（还有林彪及没有上山的黄永胜），毛一直没有放过他们，庐山的事没有个完，直至走到了“九一三”。

2009年9月

【史林一叶】

19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

晓 明

平乐县城位于桂林市的东南面，相距约120公里。县内居民以汉族为主（约占83%），另有瑶族（约占12%）和少量壮族（约占5%）。据平乐县官方的统计，文革大屠杀（主要集中在1968年的7月至9月中旬）全县有1926人惨遭杀害（包括少数被逼致死者），是广西文革中死人最多的县之一。

一、1967年的两派之争

1966年，平乐县的文革和全国各地大致相同。1967年1月3日，县城内的各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平乐革命造反兵团联合指挥部筹委会”，推选张弓、陈美文（均为平乐中学生）、张全生（县银行干部）、梁才福（县财政办干部）等13人为委员。在外地来平乐串联学生的支持下，连续召开了两次万人大会，对县委主要领导包振仕等人进行批判和挂牌游街。

在“一月革命”风暴中，1月25日，平乐县也进行了夺权。在夺权中出现了两派之争，一派以张弓、黄家礼（汽车站工人）为首，一派以张全生、黎万常

（平乐卫校学生）为首。此时的两派之争也只是动嘴，写大字报，尚属文斗。

平乐的文革受桂林和南宁的影响很大。因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广西党政领导干部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等人于2月19日联合发表声明（习称“二一九声明”），表明改正错误和支持造反派的决心。但广西军区没有支持他们，相反却在做工作，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对南宁的造反派施压，砸了南宁“工总”，逮捕了“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强令解散南宁一些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此举遭到了南宁造反派的激烈反对。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文革小组长伍晋南与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联名发表声明（习称“四一九声明”），公开支持桂林“老多”和南宁的造反派，承认他们过去跟随韦国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一九声明”发表后，得到了南宁、桂林等地造反派的拥护，也得到了部分地、市、县党政领导干部的响应，他们也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然而此举却受到了另一部分群众和广西军区的反对。

4月22日，南宁造反派组织一万多人到《广西日报》静坐，反对广西军区对《广西日报》的军管，同时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称《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习称“四二二”），其后，广西各地的造反派先后加入到“四二二”中来，支持伍晋南，反对韦国清。

这时，广西军区则一方面支持韦国清，一方面支持另一派群众于5月25日成立“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称“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习称“联指”），公开声称“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自此，广西两派“四二二”和“联指”成为对立面，此后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支伍打韦”或“支韦打伍”进行的。

在南宁的影响下，平乐也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以张弓、冯耀坤（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白先春（航运小学教师）等为首的造反大军属“四二二”派；以张全生、朱秋麟（阳安公社团委副书记）、莫世凑（县公安局副股长）等为首的则成了“联指”派。两派之争受南宁和桂林的影响逐步升级。

早在1月19日，平乐锰矿工人陈新云曾写出“打倒党中央保皇派”的大标语，在当时的形势下（当时党中央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就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本是常见的现象，却被县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此事引起了

平乐中学造反派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镇压造反派，张弓等人前往公安局要求放人，并与公安局领导黄良和等人辩论。其后平乐中学生曾几次聚集公安局企图救出陈新云。7月14日龙驱虎、胡勇（均为平乐中学生）等人带队冲击公安局，砸烂办公室门窗，打伤了少数公安人员，“联指”派群众闻讯后当即赶到公安局，与造反派发生冲突，在武装部调解下才得到平息。

7月18日，“联指”派开始武装追捕“四二二”派群众。“联指”负责人之一的全政（平乐锰矿工人）带领40多名武装人员包围木官定村，向村里开枪射击，并抓获在该村躲避的造反派成员桂柄生（平乐搬运社工人），将其当场枪杀。这是平乐县第一次公开打死人的事件，但公安局（已经实行军管）并未依法惩办凶手。这种态度为后来的乱抓、乱杀提供了心理支持。

1967年6月份以来，南宁市内发生大规模武斗，这股武斗之风很快影响到柳州、桂林乃至全广西。平乐亦不例外——

8月24日，在平乐车站附近的安良村公路上，造反大军拦截了“联指”派乘坐的一辆救护车，从车上搜出冲锋枪、手枪、马枪、匕首、雷管等武器，后将车及随车人员12人扣留。

同日，“联指”到武装部“夺走”二百多支枪，四门炮，几十箱子弹。这是平乐的首次夺枪事件。

第二天，二塘公社武装部长黄富强带领200多武装民兵到县城占领交通大楼，这是首次由公社武装部调动农民进城武斗。造反大军闻讯也要抢占交通大楼，双方交火，造反派陈家盛被打死。

同日晚，县武装部领导召集两派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停止武斗。

然而，平乐的情况是“联指”派势力强大，武装部及公检法军管会都支持他们，各公社的武装民兵都掌握在“联指”派手中，造反派从总体上来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他们担心再受到“联指”派的进攻，总想千方百计地搞到武器以求自卫。

8月31日，造反大军的阳维树、曹景堂等一百多人，于下午4时许分乘三辆卡车到武装部夺枪。夺得枪后，经大街向平中方向急驶，“联指”当即指使平乐镇武装部长杨永喜指挥民兵在镇政府门口进行拦截。此时造反大军的第一、第二辆车已驶过，第三辆车被截，双方发生枪战，“联指”派有2人死亡，造反大

军被打死 13 人，驾驶汽车的司机周建祥就是在逃跑途中，在企图游过河时被杨永喜等人开枪打死的。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武斗。

9 月 1 日，双方在云盘岭进行武斗，二塘公社武装部部长黄富强带领民兵包围平乐中学。造反大军撤到粉岩山区，许多造反派群众同时下乡和逃到桂林躲避。

自 1967 年 5 月以来，中央为了解决广西的问题，召集两派代表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到北京学习和谈判，从 6 月 1 日至 11 月 19 日，周恩来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及党政军干部，在接见中周恩来对两派的武斗均有所批评，但对“四二二”派，特别是对桂林“老多”的维护铁路交通进行了表扬。在第五次接见后，因总理的称赞，“四二二”派曾一度声威大震，一些“联指”派群众退出该派，一些地方领导人则公开表示支持“四二二”派。在平乐县，县委书记包振仕，副书记肖天，代县长唐放，县监委书记杨宗汉，组织部长莫由典，宣传部长朱牧亚等人都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

11 月 6 日和 8 日，韦国清和广西军区分别交出了检讨书，承认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造反派认错，向毛主席请罪。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同时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的协议。1967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同意韦国清、伍晋南和广西军区的检讨，决定成立由韦国清（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欧治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孙凤章（55 军军长）、焦红光（空七军军长）、郝忠云（6955 部队副师长）、王斌（104 部队负责人）、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安平生（区党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区革筹”）。自此，广西的形势有所好转，特别是各地受压制的“四二二”派，他们以为从此会平安无事，政治上可以不再受压制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他们的意外。两派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大联合，广西各地“四二二”派仍然处在受压制的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开围剿“四二二”派的军事行动，乱杀人事件在一些地方相继出现。而这些地方的公检法、军管会和武装部却置若罔闻，对杀人凶手有意放纵，使凶杀事件愈演愈烈。

1967 年的 10 月间，平乐的一些地方仿照湖南省道县等地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源头公社源头大队率先成立了“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在召开成立大会时，公然枪杀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薛洪祥、薛红章等 5 人；接着，同安、

青龙、张家、桥亭等地也相继成立“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有的称“贫下中农行动指挥部”），乱抓人、杀人之风四起，全县先后有 12 人被杀害。

二、1968 年夏的大屠杀

1967 年冬，在广西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和区革筹小组成立的形势下。平乐两派也实现联合，外逃的造反派陆续回到县城。

1968 年 3 月 7 日县武装部出面，再次召开双方代表会议，双方都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诚意，积极筹备成立县革命委员会。

4 月 18 日，广西区革筹批示，同意成立平乐县革委会，由李崑山等 65 人组成（暂缺 10 人）。县革委会由李崑山任主任，姜凤林任第一副主任，张贵友，邹文春为副主任，李崑山、姜凤林、张贵友、邹文春、唐放、张贵生等 19 人组成常委（暂缺 9 名），两派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代表成为县革委会的委员。

4 月 23 日平乐县革委会正式成立，县里召开庆祝大会。

然而此时的广西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一些地方的“联指”派在当地武装部和军分区的支持下，公然进攻“四二二”派，随意抓人、杀人。如梧州、钦州、玉林、容县、全州、荔浦、宜山、巴马、灵山、融安、天等、大新、上思、陆川、贵县等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就是在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桂林，“联指”派也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抓人、打人、寻衅滋事，制造事端。1968 年 5 月 4 日，桂林“联指”在市区首先抢占据点，制造武斗的紧张气氛。

广西各地形势影响到平乐，平乐的两派再度分裂。而此时的县革委会却公然站在“联指”一边，造反派用广播和大字报揭露革委会的不公正，说他们是“派委会”、“骗委会”、“伪委会”。

5 月 18 日，桂林地区、桂林市“联指”在南站的东方红饭店召开桂林地区 12 县“联指”负责人会议，研究成立“桂林‘联指’保卫红色政权前线指挥部”，平乐“联指”负责人廖德权参加了这次会议。

5 月 20 日，平乐“联指”总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身为军、政干部的汪瑜（县武装部军代表）、李有先（九九分队指导员）、杨永喜（平乐镇武装部部长）、朱华麟（县法院助审员）、林志伟（桂林地区公安处治安科科长）也参加了这样的会议。林志伟在会上说：他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按照桂林地区革委会领导的意

图来的”，并在会上介绍了桂林武斗作战情况。他还说：“桂林‘老多’反对桂林地、市革委会，反对新生红色政权，武装占领了桂林师范、榕湖饭店等据点，对桂林‘联指’压力很大，要求平乐派武装人员上桂林保卫红色政权。”此次会议研究决定，1、派一个民兵小分队上桂林作战，2、召开各区“联指”和县直“联指”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布置抽调武装人员上桂林的任务，3、大造舆论，发动群众，支持“红色政权保卫战”。

5月21日“联指”总部召开各级“联指”负责人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出兵桂林，并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独立师”。师长：林秉刚，政委：张全生，副师长：全正，廖德全，副政委：朱秋麟，参谋长：张士旺，政治部主任：李水庭，后勤部长：陶凤来（县财政局副局长），副部长：朱云泽，同时决定先派出30人的小分队，定于6月9日出发桂林。

5月27日，“联指”总部组织批斗包振仕、肖天、杨宗汉、韦梓修等党政领导干部大会，会后并在县城游斗。

在此种形势下，造反大军的各级负责人及普通群众，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纷纷逃出县城到乡下躲避。张弓等造反大军负责人率领近百人逃到沙子镇（造反派势力较强大的地方）躲藏，其他的人则分散逃到粉岩、水源、福兴等地，只有少数人留在县城，躲在家里。

5月31日，桂林市“联指”头目曹铁军给平乐“联指”负责人打来电话，说：“桂林近日形势十分危急，要求平乐迅速行动起来，支援桂林”。

6月8日，平乐“联指”七千多人集会表示决心，欢送出征桂林“保卫红色政权”的武斗人员。6月9日小分队出发，到桂林后负责驻守阳桥工艺美术部大楼武斗据点。

为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在小分队出发桂林的同时，“联指”头目朱秋麟、林植溪等带领“联指”武装人员到青龙区的平西、邵塘等地以及长滩的粉岩等地追捕造反派的负责人和所谓的骨干，但是由于有当地群众的掩护，他们抓捕未遂。

6月10日，“联指”头目林秉刚、黎万常率领200多武装人员攻打造反大军在县城唯一的一个据点，声言要抓住造反大军的吴永贵。其实这个据点是空的，所有的人早已躲到乡下去了。但是，他们在平乐中学前面的河边意外地抓到了平乐镇文化站职工杨运富（造反大军成员），在林秉刚的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

李少邦、钟铭德等人，将杨运富装进麻袋，抬上船投入河中活活淹死，制造了1968年的第一起凶杀案。

6月13日，到桂林参加武斗的“联指”头目廖德权打来电话，说：“桂林联指总部要求各县迅速组织自己的队伍，在县城各路口设卡放哨，搜查来往不明的行人，见坏人就抓，以建立巩固的后方。”县城由此陷入了恐怖之中。

为了镇压“阶级敌人”，6月中旬，平乐“联指”总部决定在桂剧团设立看守所，以便关押和审判抓来的造反派成员及“四类分子”。看守所设审讯组，由吴太明（县委农村部干事）、梁培德（县林业局秘书）、钟祥斌（县安置办干部）等人组成，另从各公社抽一批武装人员来担任看守。这个看守所从此成了平乐的人间地狱，从6月中旬到9月底，这里关押的三百多人中就有四十多人惨遭杀害（经莫世凑亲自指挥杀害的就有十多人），一些幸存者则多数致伤、致残。

自从5月4日桂林市“联指”在市区首先抢占据点后，5月10日起在“联指”头目李年生、曹铁军带领下，先后到104部队、301部队、桂林警备司令部、军分区、6955部队、空军机场、雷达站、市武装部、南站军管分队等处夺枪15次，桂林地区“联指”也先后夺枪9次，抢得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大有一举歼灭桂林“老多”之势。

面对此种严峻的形势，桂林地、市革委会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将革委会的办公地搬到南面的“联指”占领区，并公然支持“联指”总部从桂林地区12个县调集8000名武装人员到桂林参战，并成立“桂北民兵师”，整个桂林市区都处在“联指”的包围之中。在此种形势下，桂林“老多”也被迫占据点，抢枪，准备自卫，以打退“联指”的进攻。

6月5日桂林“老多”首先发起反击，一举攻破了桂林“联指”的榕城饭店据点。从6月5日起至6月30日双方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多次激烈交战，均以“联指”的失利而告终。“联指”认为自己虽然人多，处于进攻地位，但武器不如“老多”的好，于是他们想到了到兴安国防仓库夺枪。

1968年6月30日至7月4日，在桂林地区“保红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地区12个县的“联指”和桂林市“联指”数千人到兴安国防仓库抢夺武器。7月1日，平乐“联指”一百多人前往兴安，7月3日抢得冲锋枪、半自动步枪500多支，轻机枪20多挺，手榴弹200多箱。其他各县“联指”也都抢得了大批武

器弹药。

7月12日“联指”重新在南、北两路发动进攻，仍遭到失败。12人被打死，18人受伤。

7月14日中午，平乐“联指”武斗人员卢红光、林海、李绍邦等24人，冲进桂林“联指”总部私设的看守所（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前的语录牌楼里），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李江、白先德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的树林里，先是用枪托打，用刺刀乱刺，然后集体枪杀，制造了一起惊天的血案。

7月15日。“联指”派为他们在武斗中的死者开追悼大会，平乐镇武装部长杨永喜公然出面策划，派梁培德、蒋明福、马家兴等人在平乐镇街道抓了所谓的“阶级敌人”林焕瑜、廖耀武、李治平、曾福祥等四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灵。

7月23日，平乐“联指”又为到桂林参加武斗的死者杨志强开追悼会，“联指”人员梁培智、马明福等人又在平乐镇街道抓了唐植真、李永汉、何伦书三人公开枪杀，为他们的死者祭灵。

8月14日，“联指”派又在跑马坪（县体育场）为武斗死者梁培明（梁培德之弟）、唐绍枝两人开追悼会，梁培智、蒋明福等人又从平乐镇街道抓了蒋正宣、吴志强、刘昌年（黄埔军校毕业生，原国军团级干部）、刘志泉、杜小梅（女）、许菊英（女）、李瑞迎（女）、陈邓氏（女）、吴瞎子（外号，并非眼瞎）等16名所谓的“阶级敌人”来公开枪杀，为“联指”死者祭灵，其中的吴瞎子是被梁培智用马刀活活砍死的。

早在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发出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事件的公告》（习称《六一七公告》），一些支持“联指”派的领导人讲话公然诬称“反共救国团已打入‘四二二’组织中”，这是为了配合南宁、柳州、桂林及各地“联指”派对“四二二”围剿所策划的政治陷害，给大屠杀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6月28日，平乐县革委会和武装部联合发出《关于贯彻〈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指示〉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立即贯彻执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斗争、大批判，认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7月初，月城公社革委会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县革委会6月28日“关于破

获‘反共救国团’案件的指示”。会后中华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在中华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斗争社员龙球宝，在严刑逼供毒打下，龙被迫屈招了在龙岩（当地一个山洞）开会成立“反共救国团”的假供，“联指”派头头们马上加紧在全公社范围内追查，使全公社 19 个大队有 350 人受牵连被关押，120 人被杀害，其后全县范围内开展大清查，掀起了一次杀人狂潮。

如 8 月 30 日，月城公社革委会负责人马国才、唐自森授意就“龙岩反革命事件”在龙福圩日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宣布各大队枪杀对象的所谓“罪状”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枪杀 13 人。唐自森参加了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鼓动杀人。

最典型的是月城公社上盆大队观音山村的一起杀人案。观音山村的周姓几家人，中共执政前周家五兄弟住焦洞村。土改时被错误划为地主，后搬到观音山村住，到 1968 年已有 4 代人，共有 40 人，此次有 6 人被杀，其中有两名死者的妻子和一名寡妇三人被轮奸，家产被抄。

据资料统计，全县清查“反共救国团”破获“反共救国团”案件 98 起，受牵连的达 1729 人，竟有 1298 人惨遭杀害。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针对广西问题的布告（习称《七三布告》），特别是 7 月 25 日周恩来和康生等在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负责人时的讲话，把广西发生的问题全部都强加在“四二二”头上，并不允许“四二二”派代表申辩发言，更加助长了“联指”派的疯狂。如果说此前的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负责人仅是在暗中支持“联指”胡作非为的话，此后则是公开支持了，公然调动部队对南宁“四二二”进行围剿，指令各地军分区、武装部对“四二二”围剿，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造舆论，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把广西的大屠杀推向了新的高潮。

7 月 12 日，平乐县革委会发出文件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全县再次掀起了乱抓人、乱杀人的高潮。

7 月 31 日，县革委以（68）平革字第 2 号文件发出通告，限令到乡下躲避的县委书记包振仕、监委书记杨汉宗、组织部长莫由典、银行行长陈广金以及某公司经理林紫、鄢定中（全都是支持“四二二”派的干部）三日内到当地权力机关报道，五日内回县城接受批斗。

8 月 1 日，朱秋麟（此前的“联指”头目在桂林指挥武斗失利，改由他去领

导)在桂林棉纺厂召开在桂林参加武斗的平乐“联指”常委会议,朱说:“家里要准备攻打沙子造反大军驻地,如果抓到张弓,要审问他反革命组织的材料后再把他搞掉。”

8月4日下午,“联指”头目莫世湊召开在平乐的常委及参谋部工作人员,直属连、排长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攻打沙子(造反大军的集结地),决定5日晚兵分两路向沙子进击,一路由常委林植溪、杨永湘带队从水路出发,在平乐乘船到福兴的湖地上岸,再由民益过协中村到沙子;另一路由直属连指导员林义文带队,乘车经二塘到班山尾经义和进入沙子。6日拂晓前两路人马都到达沙子,在沙子“联指”人员的指引下对造反派驻地进行包围。造反大军成员在睡梦中没有任何反抗,张弓、冯耀坤等75人被抓捕。

8月6日上午10时,林义文在沙子向平乐的莫世湊打电话汇报情况,要求派人来沙子处理。莫世湊接电话后向桂林的朱秋麟电话请示,朱回答说可以把张弓等人搞掉,但要问清有关材料。当晚在沙子即对张弓、冯耀坤等造反大军负责人进行严刑拷打审问,直到深夜11时,审问毫无结果。面对“联指”头头的审问,张弓等据理反驳,声言自己无罪,并指责“联指”头头们抓人、审问都是违法行为,使“联指”头头脑羞成怒,决定尽快把他们杀掉。

8月7日上午,“联指”头头们在沙子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枪杀造反派成员余海夫妇(因余海夫妇是资本家出身,被指为“阶级敌人”造反)。

中午,在沙子附近的长塘村水轮泵站附近又将王平生(县农机厂干部,造反大军负责人之一)枪杀。王平生本来是躲在乡下的,听说在沙子街的造反派全被抓后,主动向“联指”“投诚”,想交代“问题”,仍然被枪杀了。

当天下午即把张弓、冯耀坤等20多人押回平乐,关押在“联指”的监狱内,当晚即把张弓、冯耀坤(均为造反大军负责人)、余长寿(余海之子)、陈文开(平乐一小教师)、李旭平、廖祖厚(广运林场工人)等8人拉到安良木材场河边集体枪杀,尸体推入河中。

8月6日,县革委曾召开常委会议,革委会主任李崑山主持会议,研究狠抓阶级斗争问题,并于8月7日发出(68)平革字3号文件,再次勒令到乡下躲避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回县城接受批斗。

8月8日,“联指”召开各公社“联指”和县直“联指”负责人会议,武斗

师长林秉刚发表讲话，贯彻县革委会 8 月 6 日会议精神，布置全县统一行动抓人、杀人。

此次会议后，平乐镇在 8 月 18 日这天抓了一百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来游斗，游斗中，许中琪、黄云飞、罗应秋等 7 人被活活打死。

从 8 月 8 日“联指”布置杀人到 8 月 23 日，共有干部、群众 498 人被杀害。其中沙子公社的“联指”头头陈义、黄焕忠，8 月 8 日会议后，9 日回到沙子，12 日在沙子礼堂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把各大队的“阶级敌人”拉来批斗，随后把 20 多人拉去集体枪杀。全公社在 8 月中旬的几天就杀了 87 人。

8 月 17 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兵学校主持召开各县到桂林武斗的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吴华在讲话中指出：“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你们来桂林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很大贡献……桂林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

8 月 19 日，景伯承再次主持召开桂林地区 12 县与桂林市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会议地点在 104 部队驻地），宣读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的“八二〇公告”，部署“八二〇行动”，在桂林“老多”占领区抓人（8 月 10 日“老多”派已主动拆除武斗据点，上交枪支弹药），平乐“联指”头头朱秋麟、张士旺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八二〇行动”中，平乐“联指”在东江一带抓了一百多人，其中有平乐医药公司的女职工黎素平、搬运公司的李月红等 5 人，27 日被押回平乐，由梁培德、麦玉成、游象深、黄天送等人把这 5 人拉去枪杀。黎素平被打死后，“联指”凶手麦玉成并用竹签插入她的阴道。

8 月 24 日，“联指”召开会议，布置在平乐贯彻执行“八二〇公告”，莫世湊在会上讲话指出：“大搜查抓到的人不要上交，确有罪恶该干掉的，由各单位自己处理。”会后，各单位立即行动，县城戒严，全面大搜查。当晚被杀害的有桂剧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韩珠平等 6 人，25 日又杀 4 人，26 日杀 2 人，27 日一天杀 16 人，其中仅百货公司一个单位就有崔志城等 5 人被杀。

8 月 28 日，“联指”党群总部头头赖永杰、覃远镇、李义雄等人决策，将县委大院内的领导干部肖天、莫由典等 17 人押上街游斗，在游斗中莫永全、黎远

云二人被活活打死，肖天、莫由典、朱牧亚、钟荣亮、黄龙星 5 人被打致重伤。同日，县医院的“联指”头目苗德中、陆柱先等人强迫老中医师曾广承、外科医生梁民彤及黄炎、李素清四人游街，均在游斗中被活活打死。从 8 月 24 日到 9 月 5 日，前后十天，在县城内就有 65 人被杀害。

8 月 25 日，县革委主任李崑山主持常委会议，宣布杨汉宗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包振仕是“三反分子”，林紫、鄢定中是“叛徒、特务”，要缉拿归案，批斗。

8 月 27 日，到桂林武斗的“联指”人员返回平乐，李崑山组织武装部和县直机关及各单位群众上千人列队欢迎，晚上开文艺晚会慰问武斗人员，庆祝“胜利”。

9 月 2 日，“联指”总部召开负责人会议，会上朱秋麟说：“造反大军上山就是土匪，是土匪就要围剿。”会议决定组织队伍围剿造反大军到乡下躲避的人员。

9 月 5 日，县革委召开会议，“联指”常委全部列席会议（县革委和“联指”早就是一家人了），会上经研究，同意“联指”总部的意见，成立“剿匪指挥部”，把躲避到乡下的干部和造反派的成员当作“匪”来围剿。

9 月 6 日，县革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特意安排月城公社革委副主任唐自森在会上介绍月城破获“反共救国团”，阶级斗争抓得好的经验，以指导其它公社开展阶级斗争。

9 月 7 日，全县成立“剿匪指挥部”，并以县革委会的名义发布“剿匪紧急动员令”，李恒达（县武装部副部长）任总指挥，朱秋麟任副总指挥，当晚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在县广播站向全县宣读了这份“剿匪紧急动员令”。

与此同时，李崑山在武装部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会议，研究部署调武装民兵参加“围剿”的实施方案，当天下午即行动，调动了六个公社民兵共 760 多人。

从 9 月 7 日到 9 月 16 日，在十天的所谓“剿匪”行动中，使全县再次陷入恐怖之中，“围剿”和清查“反共救国团”、“暗杀团”双管齐下，又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中有白先春（小学教师，造反大军负责人，县革委委员）、夏景昇（县五金公司股长，造反大军常委）、以及黄海才、唐树岗、黄伟才、何自辉、郑家雄、李庚桃、周继发、曹景堂、李星华、陈桂治、黄运来、邱仕文、黎爱琼、张与民等一大批人先后被抓、被枪杀。

9月14日，在木官定村抓到“匪首”林紫、鄢定中二人，因为要搞“活人展览”，让全县人民参观、批斗，没有杀此二人，他们的性命得以保住了。

为期十天的“剿匪”，打死21人，各单位又以“匪”和与“匪”有联系为由，杀了77人，共杀害98人。

9月17日召开“剿匪”胜利结束庆功会，县革委和县武装部设宴招待“剿匪”人员，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发表讲话，表扬“剿匪”人员。会后县革委和武装部领导人及“联指”头目张贵友、李恒达、苏绍圣等十多人合影留念。晚上开文艺晚会，慰问“剿匪”人员。

上面记述的受难者只是当时受难者中的一小部分，尚有许多许多的受难者都是十分悲惨的。如：某公社党委书记黄吕操和县委干部肖汉辉，当造反大军逃到乡下躲藏时，他们两人也逃到十八冲山村躲藏。“七三”布告下达后，8月份他们回到县城，即被“联指”关押，后肖汉辉被杀害，黄吕操则被多次游斗打致重伤，但幸存了一条生命。

食品公司干部毛作仁，是部门的造反派负责人之一，也是两派大联合时“大联委”成员，县城抓捕造反派时他一家四口人也逃到田冲山区躲避，8月返回县城时即被“联指”关押，8月31日在河边码头被打死，尸体推入河中，其妻受到多次残酷的斗争。

平乐税务局的干部周××（沙子人），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虽然参加了“四二二”派，但历来不与人争吵，“四二二”派下乡躲避时他没有去，一直在家里，很少出去，像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联指”也不放过，在8月的一个晚上把他推到河中淹死。

夏景昇是五金公司干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广西学生军积极宣传抗日，后又参加了共产党，平乐解放初曾任九区区长，是共产党的有功之臣，在文革中只因参加了造反派，不但自己惨遭杀害，他的弟弟夏克宽、夏克顺（均为老实的农民），侄儿夏绍庆、夏绍德（均为搬运工人）、夏绍喜（中学生）、夏绍群（农民）等六人也惨遭杀害，一家七个男的被杀，是平乐县被杀害最多的一个家族。

县财政局干部楼政和医药公司职工谢惠文因为参加了造反派，夫妇二人均被杀害。县交通局干部吴永贵是晚上被秘密被杀的。

街道居民梁振强曾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任班长，复员后到大厂锡矿当过工

人，后自动离职回家，1968年8月31日被杀害，是被凶手梁培智用大刀砍死的。

平乐锰矿工人陈鹰是1968年8月的一天被“联指”人员从张家抓回县城的，被凶手陈太明（民矿站临时工）用五寸铁钉从头顶钉下而惨死。

平乐镇东升厂工人陈贵志是造反派的一般成员，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数名“联指”武装人员把他从家中带走杀害，连尸体都不见了。

饮食公司的桥弟两夫妇曾回老家旱冲躲避；“七三布告”下达后，单位“联指”对他们说没事了，叫他们回单位。8月的一天他们返回县城，一进街即被“联指”派用棍棒活活打死。

附城公社中学教师郭光宪仅因为是造反派就被枪杀了，水源大队小学教师李国宗也是因为参加了造反派而被“联指”凶手用木棍活活打死。

二塘中学女学生申广秀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只因是“四二二”派的负责人之一（宣传部长），被“联指”派押送到二塘公社各大队轮流批斗，并多次受到轮奸，最后惨遭杀害。

二塘公社山背村“地主分子”李林结全家6人被杀，财产和粮食被抢光。

二塘公社谢家村，凶手们杀人后，竟强令一个到该村入赘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尹之清（民主人士、原国军中将尹承刚的亲侄子）去割下被害者的人头。尹之清本是个老实本分而又胆小的人，正因为如此，凶手们为了取乐才逼他这样做。

二塘公社良龙大队在刮“十二级台风”时，在大队干部黄刚富、黄仁服、蓝彰发等的指挥下，召开群众大会，光天化日之下杀了赵养古、钟文胜、钟英赋、蓝海清、张发瑞、罗贵英和洪阿养母子等七人。洪阿养还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只因他的母亲是富农，也被杀了，杀后家产和粮食被抢光。

月城公社的金山大队，在大队干部陈友香和民兵营长陈友仁等人的指挥下，秘密杀害了潘水发父子、潘先林、关凤国、潘孝林、潘老兆、林水发、郭嗣茂、谢彰荣和谢发荣两兄弟、郭桥生、蓝盛林、徐葵中等13位农民（有的是地主成分），并公开枪杀了金山小学教师温素杰（女）、陈贵珍（女）、梁良忠等三人。陈贵珍还是凶手陈友香的本家人，她痛苦哀求都不能幸免。

金山中医诊所医生蓝宗炉是9月12日被平乐县卫生局干部肖焦生等“联指”武装人员非法抓到马蹄井“剿匪大队一中队”驻地，平乐县法院院长曾冬梅当时支持“联指”派的胡作非为，亲自参加了对蓝宗炉的所谓“审问”。9月13日由

杀人凶手金山大队的陈彰权和福兴大队的陆明飞把蓝宗炉押到平乐黑山脚河边枪杀，同时把安良村的谢世明拉去陪杀，把蓝宗炉打死后，强令谢世明将蓝宗炉的尸体拖入河中。

在沙子公社的维新，全大队当时只有两千多一点的人口，1968年的8、9月间，竟杀害了50多人，如刘××（小名聋子满）、刘阿代、严福桥、严水石、林中枢、严阿七、严时贵、黄石发、关友梅和她的母亲、严维成等人。这些都是老实的农民，严时贵是小学教师，只因是支持“四二二”派的观点，有的虽是地主成分，但什么派也没有参加，都被杀害了。杀人的主谋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曾太生，在他的主使下，凶手们用石头、木棍、刀等凶器把人杀死，有的用枪杀，把人打死后尸体都丢入河中。

沙子公社的沙子大队也有数十人惨遭杀害，其中的龙山洲生产小队，当时只有两百人口，杀害了黄桥登、黄德运、吴运红、唐文松（地主家庭出身）等4人，这些都是老实的农民。

类似这样的凶杀案件在各公社、大队是太多了，只是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未能一一搜集到相关的资料而已。

三、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一、产生大屠杀的原因

1、毛的歪理邪说深入人心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就是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搬演。毛泽东当年号召穷人起来革命，抢夺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和田地，杀地主的同时也杀自己人。苏区时期的内部肃反，打“AB团”，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1949年前后的暴力土改，杀地主，其后的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毛的歪理邪说的恶果。文革中，毛的歪理邪说更有了新的发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及由林彪掀起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文革中许多人正是在这种邪恶的思想指导下而干出种种罪恶行径的。

2、文革当局纵容屠杀

当地政府对平乐大屠杀不作为，以至乱作为。如1967年7月18日，平乐“联

指”武装追捕不同观点的群众，“联指”头目全政带领武装人员到木官定村，包围村庄抓到在该村躲避的搬运社工人桂炳生，当场将其打死。这是一起刑事凶杀案，但当时的公检法军管会、抓促领导小组、县武装部等权力机关不立案侦查处理，放纵杀人凶手。

又如 1967 年的 10 月间，在源头、同安、青龙、张家、桥亭等一些地方，一些人非法成立什么“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公然召开群众大会枪杀地、富家庭出身的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凶杀案，权力机关不闻不问，任杀人凶手逍遥法外。

如果说，1968 年夏之前是政府不作为，那么之后就是政府乱作为了。1968 年的平乐大屠杀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行为。以革委会的名义发文件，大张旗鼓抓“反共救国团”，放纵“联指”派私设监狱，“六一七公告”和“七三布告”下达后，动员各级政府造反派中抓“反共救国团”，清理“阶级敌人”，随意抓人、打人、杀人，组织“剿匪指挥部”围剿下乡躲避的干部和群众，把抓到的人随意处死；“联指”派武斗人员战死后开追悼会，三次都在街道随意抓人枪杀来陪葬；县革委会开会“联指”常委到会，支持到桂林武斗，武斗人员从桂林返回平乐时组织盛大欢迎会。

二、杀人凶手为什么逍遥法外

平乐大屠杀十多年后，司法部门对杀人凶手不闻不问。这些杀人凶手和幕后指挥者不但长期不受惩处，反倒成了“功臣”。一些人入党，提干升迁。据平乐县后来统计，杀人后提拔当干部的有 118 人，被招工从农民变成工人的 155 人，入党的 364 人。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成了县革委会的委员。其他的杀人指挥者莫世凑、林秉刚等都得到升迁。而那些受害者则长期背上了“反革命”的罪名，受害者的家属则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桂林市的张雄飞、许瑞林、李新等人带头写出大字报，揭露桂林 1968 年“八二〇”乱抓人、打人、杀人，全桂林地区 12 个县杀人无数。韦国清下令把张雄飞、许瑞林等 20 多人当成“现行反革命”抓捕，判以重罪。

到了 1976 年春夏，“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又通过广西日报把 1974 年桂林抓捕的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是“右倾翻案”；而到了 1976 年冬天“四人帮”

倒台后，他们又把张雄飞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正是由于广西的大权都掌握在韦国清和他的党羽手中，杀人凶手才能长期逍遥法外。

三、“处遗”的遗憾

“四人帮”倒台后，广西除了各级干部恢复了工作之外，文革中的问题没有得到清算，杀人凶手未作处理，冤假错案未得到平反。直到1982年全国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名曰“处遗”）结束多年之后，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在广西人民迫切要求之下，在胡耀邦等人的过问下，在大屠杀事件发生15年之后，广西才真正开始了文革的处遗工作。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韦国清调到广州，其后又调到北京升迁了），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犯了错误。其后乔晓光检讨了错误。在中央的过问和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才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先后发出了1983年54、55、56号文件，开始了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其后各地、市、县都相继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抽调一批干部从事处遗工作。首先是调查核实各地的冤假错案和打死人的情况，然后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当年的“七三布告”，特别是否定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的“六一七公告”和桂林的“八二〇公告”。对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被杀害或被迫害致死者一律给予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每个死者发给丧葬费100元，抚恤费120元；属于国家干部和单位职工被杀害的，除给予上述补贴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至18岁，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者给予定期的生活补助。

广西的文革处遗是一大进步，但也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

（1）对杀人凶手和杀人的直接指挥者处理过宽。全县被杀害了1926人，许多被打致伤、致残尚未包括在内，而处遗中对杀人凶手和与杀人有关的人立案审查的只有1446人，最后给予处分的为1165人，免于处分的281人。

在被处理的1165人中，给予刑事法办的仅50人，其中杀人的直接指挥者朱秋麟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莫世湊和林秉刚被判无期徒刑；其他的杀人凶手

或杀人指挥者曾太生、杨永喜、白焯斐、梁培德、林义文、梁权金、唐自森、麦玉成、廖得全、何作邦、叶八金、梁培智、蒋明福等 47 人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至 4 年不等。没有一个凶手被执行死刑。

(2) 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在被处分的 1165 人中，除 50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外，有 1115 人仅给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公职的 30 人，开除党籍的 561 人，开除公职的 9 人，党纪、政纪处分的 565 人。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的惩处。更有 281 人免于任何处分。

(3) 经济的补偿。每个遇难者仅给 100 元的丧葬费，120 元的抚恤金，这总共 220 元钱就打发了一条性命。那些受过迫害的“走资派”，不但恢复了名誉，经济上也得到优厚的补偿，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与许许多多失去生命的人相比就实在显得不公平了。

回顾历史，拒绝遗忘。谨以此文悼念那些不幸遇难的平乐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愿他（她）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愿他（她）们在天之灵保佑后世的芸芸众生。

本文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

1、《平乐县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3 年 12 月

2、《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 年 7 月

3、中共广西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册〕，1987 年 11 月

4、大屠杀的幸存者和受难者家属，鄢定中、谢世明、夏春林、洪宗祥、莫祥英、李××、蓝××、陈××、郭××等十多人的口述资料

5、当年参加武斗和武装围剿“四二二”派的原“联指”派成员黄××、尹××、钟××、卢××等人的口述资料

6、当年耳闻目睹抓人、打人、杀人的旁观者蓝××、严××、潘××、陈××等十多人的口述资料

谨对上述书籍的作者和资料提供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蓦然回首】

作者简介：马文蔚，女，1940年生于北京。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任编辑。文革刚开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1月入狱，同年9月出狱。仍被“群众专政”。1979年平反后，自己联系调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87年因“自由化”被免职，到出版社工作至退休。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一）：风暴骤起

马文蔚

黑色星期一

过了一个普通的星期天，第二天，1966年6月6日一早，同每个星期一样，起床、锻炼、早读、洗漱，然后匆忙去食堂吃早点，赶去办公室。我所在的广播电台汉文编辑部农牧组，几张桌子靠墙摆放，大家脸冲墙、背对背。低头编稿到九点多钟，楼道里有些嘈杂，组里也有人匆匆进出。快到工间休息了，索性出去转转。走到楼中间、楼梯盘旋类似天井的地方，忽见靠墙一侧挂满了绿纸大字报。几个人在那里登着椅子拉铁丝、来回忙乎着。一溜玻璃窗被挡住，光线很暗。小字看不大清，找到开头，大字标题赫然入目：

马文蔚是什么人？

我？再看：

马，文，蔚，是什么人？

仿佛一闷棍砸下来，脑袋轰一下大了，心突突地狂跳不止。想细看，眼睛不受使唤。溜了几行字，不明白什么意思。挂大字报的人已发现我，铁着脸不作声。我告诫自己：冷静，冷静！无论如何沉住气，仔细看明白！

第一篇大意是：马文蔚在三年前曾说毛主席的字不好看，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都好”，这是骄傲自满的问题吗？这是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

第二篇说，马文蔚经常同台长唱反调（包括给台长起外号等）。还对批判三家村、吴晗有看法，“狂妄攻击党”，“是三家村的门徒！”

回到办公室，心里乱到极点。屋里异常的静，大家都低着头，对着面前一张稿纸。我心里开了锅。我“攻击毛主席”？我是“三家村的门徒”？我就是缺点再多，也不至于成为革命的对立面吧？我是一名团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二月份还参加了全台学习毛著经验交流座谈会呢。我虽有时思想跟不上，被人批评，但我对自己是严格要求的。他们为什么把我看得那么坏？

写大字报的人，一位是汉文编辑部（简称汉编部）文艺组副组长，另一位是驻昭盟记者，“盟”相当于“地区”，当时内蒙有七盟二市。）此二人和我素无来往。大字报说“三年前”，可能是指台里“小整风”（即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得毛主席字的问题，是因议论 1963 年 3 月 5 日报上的几幅题词引起，是“小整风”中对我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当时上纲到“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我不同意，组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最后允许“保留个人意见”。几年来并无人提起，我自己都忘了。看来人家没有忘，给我记着账呢。

第二篇大字报所云，不知从哪里来的，有些影子，又不大像，我很难一下子想出原本是怎么回事。

两位并不了解我的人偏偏来揭发我，那就不是什么个人行为。对了，他俩都是党员。刚才在那里忙乎的矮个子我怎么忽略了，他是汉编部专职的政治协理员哪！这样说来一定是党支部安排的。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两天前，上星期六（6月4日）下午，团组织活动。读《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读改组北京市委的报道，给我震动不小。北京是首都，党中央所在地。北京的领导人都是深孚众望的老革命，他们怎么会反党？这已不是“文化”革命了。哪里想到，距离遥远、难以理解的这场革命，只隔一个星期天就落到我头上？这就是电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只是一名 26 岁的小编辑。工作才四年多时间。除去“四清”八个月，正经工作也只三年多。在编辑堆里，我不是最小也是倒数第二；始终觉得自己是小字辈、新来的，别人都是我的老师甚至长辈。我一个末座编辑竟成了电台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

中午，满腹疑虑地向食堂走去。下楼穿过大字报“走廊”，数量又多了一些，

蒙文编辑部也加入进来，都是杀向我的。内容没有新的，口号却更强硬更占地方。我默默地走着，暗暗希望吃饭时能碰见一个说得上话的人，哪怕只说一两句……

食堂在大院的北边，原绥远省广播电台旧址的一排平房里。有家的职工多是打回去吃，单身汉则挤在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屋子里。我去时，两张大圆桌一张已经坐满，另一张有两个人。我端着饭菜走过去，刚想坐，没来得及向那两位打招呼，他俩便急忙站起来，挤向已坐满的另一张桌子。那个用臂肘拱开别人、强行挤进的背影，我至今未能忘掉。我一个人，始终是一个人，坐一张大圆桌，吃完这餐饭。没有人过来，没有人和我说一句。

原来，就这么短短两个多小时，我成了另一个人——不可以接触、甚至看一眼都会带来麻烦的异类！我真是太幼稚了，还想同谁诉说心中的疑问和苦恼！我已没有熟人，没有朋友，只有自己，一个孤独的存在。

对于从未亲历任何政治运动的我，这时真是“懵”了！1957年人大新闻系试验性地招收了一部分应届高中生，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个。走进海运仓校址，见过夏季反右时残留的大字报。开学后也进行了“反右补课”，参加上年级批斗右派的会。但那时我们只是旁听、受教育。

下午是上午的继续，大字报更多了。楼道挂满了铁丝（开始很注意爱护墙面，不直接刷浆糊），将大字报别在铁丝上。看大字报成了工作，隔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新的。靶子只我一个，枪手越来越多。

我写了一个简短的“保证”，表明我是要革命的，欢迎大家批评。交给政治协理员，心里比上午略稳了些。其实这哪里是什么“批评”！想自己是一个心里存不住东西、直来直去的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竟被看得那么坏，冤枉啊！现在一个人面对屈辱，面对恶毒冰冷的环境，只有告诉自己挺住。还好，尽管疑问多得打结，万箭钻心般疼痛，还是挺住了，没有垮。没有流泪，没有失态。

晚饭后，习惯地去办公室。没人理我，对自己说说总可以吧。上高中以来，每天记日记，一天不记仿佛这天没过，共记了四大本。这天楼里大异于往日，寂静无声。组里人也都没有来。刚要记，组长轻声走进，很意外地跟我说话了。只是没有了往日的轻松，脸上一本正经，眼睛不时瞄着门。他是顶头上司，又是党员，我索性再次表态：我是要革命的，虽然有些大字报内容不符合事实，我也要正确对待。现在不能解释。他说，这是考验你的时候，要革命，要达到飞跃。他

说到日记：人家说你一不高兴就记，都写什么呢？（这句话当时没引起我注意。）那晚，我只觉得感激。觉得组长到底和别人不一样，敢跟我说话，关心我。

艰难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记得第二天（6月7日）上午9点多，政治协理员走到我桌旁，弓着身子，紧盯着我说：“一会儿编辑部开会。（停顿）大家都去。（更大停顿）你不去。”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通知我？一字一顿，非常强调，无非是提醒我，我已成了异类，深怕我忘了同革命群众的天壤之别。与他对视的那一刻，忽觉生疏。以往给人憨厚印象的脸，变得冷酷。他曾是志愿军，他爱人是我中学的同届同学，通过给志愿军叔叔写信认识的。他家从基层搬来呼和浩特时，我和几位同事曾去探望。

第二、三天，一个星期，大字报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写大字报的人遍全台，技术部门、行政部门，认识不认识的都冲我来。内容多是重复汉编部的，规模却大多了。我一个小编辑竟成了电台文革的起始和重点。

勒令交出“反动日记”

6月8日，上班时忽见对着办公室门、很醒目的地方，有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马文蔚，敢不敢把你的反动日记交出来？”下署“汉编革命群众”。我认出是一位播音员的字，没料到这一招——要我交日记。日记是对自己说的话，凭什么给别人看？我曾对组长说“必要时可以读给大家听”，是“必要时”由我“读给大家听”，所有权在我，凭什么交给你们？那时不懂得说“隐私权”（懂得也没用），只是不想给他们看。真想撕个粉碎、烧成灰。我没有马上做出反应，坐在那里斗争了很久。那时我并未失去自由，没有人盯梢。若真想处理掉并非难事。又一想，凭什么说是“反动日记”？有缺点错误可能，决不反动。如果处理掉反没有了证据，怎能证明我的清白？岂不由他们栽赃陷害了？不，绝不能销毁。我深知不是反动日记，怕你什么！

沉了一晚，大约是第二天下午，我把四大本日记拿给他们。记得是驻呼盟记者（党员）代表“革命群众”接收的。此人同其他驻地记者一样，跟我不熟。奇瘦，两肩支起，走路时双腿微微晃动。那时群众初步分化，阵营尚未形成。他接过日记，仿佛闪过一丝笑意，说了一句奇怪的话：“也没说一定让你交嘛。”一句假惺惺装好人的话，也或许这个级别较高的记者比别人多一点政策观念？我没有

侥幸心理，知道既然大字报叫号，岂容我不交？交了，就踏实了。想他们看后不会再说是“反动日记”了。

当晚，还做了一件极可笑、极愚蠢的事——上街买日记本，接着记。现在实在想不通当时的我为什么要再次自投罗网。果然没记两天，又被“勒令”交出。这才明白不能再记了——从那时到现在，没再记过一个字。

“乌兰图嘎”和“三家村”

在疑惑、屈辱中孤独地度过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一，出现了新情况。一篇长长的新大字报覆盖在原有的大字报之上，落款占了半页纸，名为“乌兰图嘎”。本来，对揭批我的内容已不用细看，扫一眼即知是重复某事；这一篇显然不同，那位置、那署名让人觉得霸气。除我之外，又出现了新目标——我的同学 A。罪状主要是：一、严重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曾说“到内蒙后没听过一个像样的报告”；二、不安心本职工作，曾提出报考文艺理论研究生；三、读封、资、修的书，对改造世界观有抵触情绪。同反对毛主席的马某人沆瀣一气。联系到家庭出身，说他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六位同来内蒙、四位分到电台的同学中，A 是唯一与我同班的。我们关系不远不近，但我绝对知道他是好人。他生长在安徽，中等身材，眉眼细细长长的，很是秀气、和善。爱读书、喜欢文学。因兴趣不在新闻，想考研、改行。编辑部领导问询我的意见，我说是好事，应放行。后因他报的导师在全国只招两名研究生，而且据说已从应届生中内定了，他这类考生不贴边，没考取，反落下话把儿。A 话不多，给人清高孤傲的感觉。我和他不在一组，顶多晚上串串办公室，说几句话。1964 年“小整风”对他的批评很严厉，他想不通，跟我聊过；我很同情他，但我比他挨批更严重，帮不上忙。我们虽然谈得不多、不深，但彼此信任。今天“乌兰图嘎”给他上纲之高，是我没料到也不理解的。

“乌兰”是红，“图嘎”不知何意。背后有人轻声议论，是蒙语“旗”。后来听说是由新闻组长和给我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文艺组副组长等人组成。几个人用一个化名，像一个组织。当时还没有“战斗队”一说，他们显然是汉编部的先锋，最体现党支部意图的一伙。不同于散兵游勇，难怪霸气。他们都是汉族，平时一句蒙语不说，何苦假惺惺起个蒙古名？

新闻组长（兼记者组长），党员，北京通县人，是一位著名右派作家的小叔叔。此作家 14 岁时写的《青枝绿叶》选入高一课本，我喜欢，对他怀有敬意。听新闻组长说，他和此作家年龄相仿，小时一起读书。于是我对他也怀有好感。但他的“兵”不喜欢他，有人说他像监工的。我没当过他的“兵”，对他了解有限。A 同学在他组里时间很长了，即使有缺点，做领导的也该善意帮助，怎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来当敌人打？

上星期，我在最苦闷、最孤立之时，曾想跟 A 同学谈几句。但他离我老远就把头低下去。我想算了，千万别给人家添麻烦。这张大字报对他不知会有多大打击！第二个星期，大字报多集中在 A 身上。他在学校时就受过团内的“帮助”。那时我还未入团，没有资格参加会。听说是认为他读书方向有问题。领着助学金（丙等：六元三角）还买古书、线装书。在那个年代，不买马列的书而买古书，就是天大的问题。他如何解释我不得而知，我猜想那些书一定不贵。谁没有个爱好呢，我们大学四年，受“帮助”的不只他一个。临毕业时，陈毅作报告，谈到对学生过火的批判，曾向受批判的同学脱帽鞠躬，下面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回校后开会讨论，很多同学哭了。A 也激动地发了言。那时我不懂“家庭出身”对人会有如此沉重的压力、深远的影响。此时，我多少悟出一点，他蔫巴巴的性格一定与此有关。我不怪他，我为我们共同的遭遇难过。

第三个星期，又揪出另一位同学 B。说我们是“三家村”。我是“急先锋”，A 是“军师”，B 是“村长”。说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领导和同事，“没有一个看得起的”，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和北京的“三家村”“遥相呼应”，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小集团，等等。

真是越来越没影。分配来内蒙时，B 是六人中带队的，党员，调干生，上海人。瘦瘦高高的，人很精明。到电台后，虽不是组长副组长，也比我们老练多了。平时也有嘻嘻哈哈的时候，正经场合，多站在正确立场批评我们——几幅学雷锋题词“哪个写得好”，即是他拿着那张报，放到我桌子上，向我提问的。他怎么也被揪上审判台，和我们混迹一处，还当我们的“村长”呢？我们三个虽是同学，并不亲密，意见多不一致，算不上“小圈子”。说“有政治野心”，还和北京的“三家村”遥相呼应，太离谱了！

到底是广播电台，没忘看家本领。每早，一辆广播车开出大门，在呼市主要

街道游走，用高音喇叭反复声讨我们的“罪行”。我是后来从党委、人委一些熟人那里听到的，想必我们臭名远扬了。

我们三个同学，遭受的压力难以想象。我已完全放弃与他俩碰面、交谈的想法。三个人都在电台，却像远隔千里。后来他们加入造反派，再后来又调回老家。1967年夏天，A同学自己联系调到安徽一个县。临走时，在宿舍门口笨手笨脚地往排子车上捆行李。我见周围无人，想去帮忙并告别。没等我走近他就连连摆手，嘴里低声说着什么，好像是：“不用，你走吧。”我说：“再见了！”他没看我，只点了一下头。四十年后我们有幸再见面，略微弥补了当时不能交谈的遗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汉编部主任有一天在办公室说：汉编有“三家村”，蒙编有没有？我当时在屋里坐着，他没有回避我。我看他面露得意，像在煽风点火，立刻闪过一种想法：如果电台、编辑部搞不好，责任都在我们这些小人物，你们当主要领导的反倒没事，这合理吗？

第四个星期，运动在扩展。我们三人已不是全台仅有的敌人了，各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新靶子。汉编文艺组长，1951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四川人，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是电台唯一的非党员组长。那时我觉得他有些“迂”，写稿爱用毛笔（字很棒），时常发生一些小笑话。有天早晨上班，脸色通红、喘气急促。不等坐定，就一副哭腔地发泄道：小孩子把我的毕业论文剪了做纸毽踢，她妈妈也不管，气死我啰！他年轻时，曾在重庆一个三青团主办的学校就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蒋邀毛看文艺表演，该校学生奉命到礼堂陪看，他也在其中。他不是三青团员。不知他向什么人谈及这一经历——与毛主席早有一面之缘，昔日听众后来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揭发他是“三青团”。他上中学时，在青城山学校练过武术，这一经历被篡改为“峨嵋山武术特务”，后又升级为“中统特务”，令他百口莫辩。

录音组一名技术员，北京人。他曾跟人闲聊，说家里有一块怀表，后面刻有“蒋中正赠”的字样。这次被揪出，说他父亲能得到蒋某人的赠物，肯定不是普通的军官。联系他平日的胡吹乱侃，就成了梦想变天的反攻倒算者。另外还有几位被揪，理由也放不到桌面上。

蒙文编辑部没有揪出“三家村”，他们把矛头指向一个爱说怪话的老编辑，还有两位副主任。蒙编的大字报很奇特，使我至今不忘。

某副主任五十岁上下。典型的蒙古族的宽脸、细眼睛，有点酒糟鼻。大字报说，他每天迟到。进门先沏茶、吃炒米。编辑把中午播出的稿子交他审查签字，他放桌上不看。十点多，编辑来催，见他吃喝得满头大汗，在看报。稿子原封未动。十一点编辑着急了，因播出前还要录音。编辑怯生生地问：达勒嘎（蒙语“领导”、“头儿”的意思），稿子审完没有？不录音怕来不及了。副主任示意他坐下，慢慢地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问：“稿子里有没有反对毛主席、共产党的话？”“没有。”“有没有反对内蒙党委和乌兰夫的话？”“没有。”“有没有对党的政策不满的话？”“没有。”“没有？发。”看了真想笑。大字报前，也有人忍不住在偷偷笑。当时我只觉得可乐，若干年后，看法有所改变。觉得此人深得审稿三昧。

另一副主任分管文艺，很在行。据说他参加革命很早，只因不断犯点小错误，降过级，否则该是军级了。他倒一点不在乎。大字报揭发，他对人讲过一件事：建国初期，他和另一位老艺人（可能是毛依罕）随团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好力宝”（一种民间说唱形式，自拉四胡伴唱。内容可以是传统脚本，也可以即兴编词）。可能因为紧张，他唱到某一处，忽然忘了词。就对那人唱道：“下面的词，我忘了。你接着唱吧！”可巧那人也记不得了，对他唱道：“我也想不起来了，还是你唱吧！”台下观众不懂蒙语，看他俩一唱一和、情绪交流绝好，使劲鼓掌。他俩瞎编了几句，在热烈的掌声中鞠躬下台。他很得意这件事，没出漏子，总算对付下来了。现在革命群众不这样看，说他们是在欺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

其他部门也揪出不少，从“历史反革命”到“流氓”、“坏分子”都有。

——2002年底，我看到文艺组长的新书《鳞爪集》。前插页中有参加蒋招待毛的晚会后，所写一页日记的影印件，读后心有所动。打听到他住在海南女儿家，赶紧电话联系。我说，“这页日记，正是大字报‘揭发’的事。你是特意放在书里的吧？”他说是的。又问：“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呢？”他说，“是我自己向组织交代的。”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后他来信说到被诬为“峨嵋山武术特务”事：“我在川时从未去过峨嵋山，故退休后我两游该山，不然太冤了。”

文革到底要干什么——两个月后初露端倪

汉编部不愧是全台的重点，近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成异类。这些人仍在工作，没有完全失去自由。有的暂时挪动了岗位，其实这种担心完全多余。我们如是暗藏的敌人，在电台这样的要害地方，要破坏早破坏了，还用等到今天！这些人没有公开为自己申辩，是“听党的话”，“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有一个人给我很深的印象，即蒙编部那位怪脾气的老编辑。他一点不能容忍。在别人给他贴的每一张大字报下面，都不成比例地别上一张小条，用小字密密麻麻写上反驳意见。这在全台是独一份。“革命群众”只习惯别人“低头认罪”，岂能容忍“反动气焰如此嚣张”！于是，大字报前往往发生对骂、对打的事。相当一些人说他是疯子，丧失了理智。我那时对他的行为也不认同。现在倒觉得他很勇敢，在高压面前不屈服，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名誉。

对国家命运我从未担忧，相信党中央的伟大英明正确。只是为自己的前途命运，不得不去思考文革到底要干什么。7月底刘邓在北京的讲话，很快传到内蒙。全台职工在大播音馆听录音。周、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听了让我疑惑不解。不久，又传出他们派工作组是背着伟大领袖干的，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已受到批评，不日即撤出——这又不好理解。

最早，一些文艺作品受批判，我不赞成；后又上纲到政治斗争，我想不通。《二月提纲》说，应限制在学术范围，我觉得有理。《五一六通知》又批判《二月提纲》，说是背着中央搞的。说不是学术斗争，是政治斗争，我又惶恐起来。现在这样搞就对吗？

直到《十六条》公布，才看到久久等待的关于文革性质的说法：“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具体的杠杠，起码说明“重点”不是我们这些小不拉子群众。我开始悟到，那些党员和当官的，在运动起始尚不明了最高领导意图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向群众开刀，是牢记以往经验，按反右的套路走，先抓些“问题分子”，掌握主动，远离危险。他们比我们有心计多了。

《十六条》使一些人闻风而动，迅速把矛头指向领导——当权派。当权派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们成了死老虎。最戏剧性的是，针对汉编部主任的第一张大

字报，是他妻子、报社编辑部造反派头头贴的。揭露他是反动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员。（据后来向知情人了解：是报社一名记者从公安厅看到内部材料，其中一个名字有些像。造反派为争取主动，令她抢先一步去贴大字报。她进电台大门时腿直抖，差点上不去台阶。）主任事先毫不知情，顿时蔫了。他妻子是一位很能干、乐于助人的记者，电台很多同事都有体会。她这样做，心里一定很矛盾、很痛苦。

有《十六条》的白纸黑字，也基于对运动发展的认识，我觉得电台这种搞法是错误的。想来想去，我应该找工作组谈谈。那时当权派已起不了作用，工作组也还没有撤。派到电台的工作组以工人为主，尽管他们对台里的运动没起过什么直接作用，但他们是台里的最高领导，只能找他们。

一天上班后，我鼓足勇气走进工作组的办公室。一位副手接待我。我站着，他也站着。他把手插在裤兜里走来走去，以侧面对着我。我尽可能缓和地谈了我的看法，说现在有《十六条》了，应以此为准，分清两类矛盾，分清是非。他走来走去、似听非听。好半天，突然大声对我喊：“《十六条》是为革命群众服务的，不是为反革命利用的！”我原以为工作组超脱些，能掌握运动的大方向。他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中央政策呢？他凭什么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我就无权谈论《十六条》？一大堆话堵在嗓子眼儿，看他那样子，不值得我再说一句。百分百的失望加悲痛，我转身走了出来。尽量控制自己，没当着他失态。跑回宿舍，实在忍不住，大哭一场——当了两个月“反革命”，没有流过泪。这是第一次在自己面前软弱了一回。这也是文革中为自己的事，仅有的一次痛哭。以后再遭受什么，也难以让我动真情了。

令人脊背冒寒气的人斗人

编辑部主任落下马来，随后正副台长、各部处大部分领导都被贴了大字报，成了走资派。“乌兰图嘎”的主将——第一个给我贴大字报的新闻组长，刹那间变为革命对象。我们死老虎被晾在一旁，稍显松动，得以作圈外观。当然事情远没有完——审查我的“反动日记”的小组，正在一间单辟出的办公室闭门奋斗。

一天下午，听到新闻组大呼小叫。一间双开门的大办公室，我进去时已有二十来人，正在围斗组长。组长低着头，含混不清的交代中，间隔着他特有的吸鼻

子声。斗他的，以他手下的记者为主，外围稀稀拉拉站些年轻编辑。给我贴大字报的那位昭盟记者最为靠近，声音尖利、话语刻薄。只听这位记者喊道：“我叫你不老实，我叫你不老实！”抬手向组长的后脖颈砸去。组长一晃，差点摔倒，纸帽裂开一道大缝，露出后脑的头发。这记者见状，撕一张稿纸，厚厚涂满浆糊，啪！拍在组长的后脑勺上，管它帽子头发，糊在一起。他朝身边的人作个鬼脸，又厉声喝道：“交代！”组长是他的直接领导，几天前他们还是“乌兰图嘎”的战友，翻脸即成仇人。

一天在办公室听到一种奇怪的敲打声，夹杂着人声，由远而近。能分辨出是锣鼓和一些铁器，快慢不一、敲不成点。出去一看，原来是在院内游斗走资派。队首是局长兼台长，翻穿一件破皮大衣，后脖颈插一根高高的鸡毛掸子。随后是副局长兼副台长，一个小个子河南女人。头戴尖纸帽，两耳各挂一串红辣椒，脖子挎一双破烂鞋……后面几位同样被装扮得奇形怪状。他们一行人面无表情，眼睛盯着地面。手里的家伙除了鼓、锣、钹外，还有铁桶、簸箕、炉勺、烟筒等。革命群众逼着他们边敲边喊：“我是走资派”、“我是××”。稍有迟疑，立刻有人从背后戳点。我不愿多看，赶紧离开了。这究竟算什么意义上的革命呢？

据说文化局运动开展得好，值得学习推广。办公楼前贴出通知，说某日下午去文化局“参观学习”。对这种事真没兴趣，但不去又是罪过。文化局和电台只隔一个新华广场，广场的东北面即是。我去时，墙外空场上已站满人，中间围着约两个篮球场大的地方。我找一个小土坡站上去，见一队人立正站齐，听人训话。训话间歇时，有人领着背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语录，往往是武斗的前奏。我正想离开，只听训话人大声喊：“向右转！齐步走！”原来已到尾声。“唱黑帮歌！明太，起头儿！”排头的人小声唱了一句，说：“一、二！”一队人就唱了起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唱到此处，左右开弓、自打耳光）人民让我低头，我要低头认罪；如果我不认罪，人民把我砸烂、砸碎！”……黑帮队远去，声音渐小。我第一次听这首“黑帮歌”，也是唯一的一次。仅此一次，非常奇怪地，我记住了，直到现在，那词、曲，那一队黑帮，及自打耳光的动作，深深印在记忆中。我当时像钉在那里，动弹不得。后背一阵阵发冷，极为恐怖。

被迫起头儿唱的明太，是蒙古族作曲家。队中一个清瘦的背影，极像是鼎鼎大名的蒙古长调民歌之王。他们原本应创作更多更优秀的歌曲，或用独一无二的歌喉，悠长婉转地唱出令人心醉的长调。现在却在这里当众受辱，唱“黑帮歌”，打自己的耳光。

太可怕了！人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作践别人！也许几天前还在一起研究创作，一起唱一起跳，一起喝酒，称兄道弟。现在却分站两边，成了专政与被专政、无法平等的两种人。

参观者散去之后，我一个人慢慢走向电台。我想，说不定哪天我也会遭到这一切，怎么办？想来想去，不能屈服。要让我这样，死也不干！

没想到，让我惊恐的人斗人，这还只是轻微的开头。往后要更频繁、更激烈、更花样翻新、更无所顾忌，给许许多多的人造成无法救治的身心伤害。

“反动日记”审查结果出笼

五、六人组成的小组，关着门审读我的日记，历时两个月，终于有了结果。任你有多强的想象力，也想不到，他们从中“整理”出二百多条“三反言论”。用很小的字抄出来，密密麻麻贴满一面墙，还“待续”。

知道这个结果，感到异乎寻常。但我这时已不像运动第一天那样晕头转向。深知此时，事事已非常规所能衡量。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二百多条三反言论，根本不可能！基于这一想法，我没有耐心自始至终读完这篇奇文，更没有记录下来——这令今天的我惭愧万分、悔之晚矣。

残留在记忆中的，有以下是一些：

一，某某有一支大红颜色的自来水笔。我不喜欢这颜色。自己的笔杆为浅驼色，曾被一起四清的一位赤峰小青年讥笑为“烧火棍子色”。不爱红色，被他们上纲为“反对革命”、“反对三面红旗”。

二，读某苏联作家作品，很喜欢。其中颂扬农民起义领袖蒲加乔夫宁愿像鹰一样喝一口鲜血马上死去，也不愿吃死尸过一辈子。（大意）从中取了我要“喝一口鲜血”，说我怀着阶级仇恨，要杀人。

三，我有时作恶梦，梦境使我害怕、感伤。记在日记里，可能有两三处。他

们直接用来说明我的思想。说我对现实严重不满，心理阴暗。

四，我从小爱画小人儿，日记中也有多处胡涂乱抹。如读书、看电影后想象着画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形象，还画些粗糙浅显的漫画，用来讽刺自己。有一幅（由9小幅组成），画一个人自顾自地向水里走，岸上人喊他回来他不听，一步步走向深处。讽刺自己不接受别人意见，固执己见。竟被他们说成“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厌世情绪严重”。“有时她觉得简直活不下去了，就往泥坑里跳。”

还有更新奇的：

五，“62年10月10日 又是我的节日。”说我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双十节”当作自己的节日，“反动透顶”……

估计是我字写得潦草，他们硬把“节目”说成“节日”了。都是做广播的，谁不知道广播以“节目”论？我要求核对日记以证实我的猜想，被拒绝；只好去查节目档案。果然那一天的《全区农村牧区联播节目》是我发的稿！看看这些人，一心想抓大个儿的政治问题，竟然不核实，可见居心不良。

诸如此类，都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他们学会了揭批“胡风集团”和“三家村”中编“黑话”的手法，抓住一两个字，任意演绎发挥。想当初交出日记时，满以为日记能证明自己的清白，真太幼稚了！

这些“三反言论”是谎言和歪理构筑的，迟早会化为乌有。我相信精神正常的人能够分辨，我不怕。真正让我害怕的，是与狂热时代不合拍、与流行说法不一致、长期困扰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里面记了不少，被抓住是很难说清的。比如1964年“小整风”中提出的对一些党员及党的基层组织的看法；对思想改造和申请入党的看法；对政治、业务关系的看法以及对文革前夕批判鬼戏与“反动文艺”的看法等。

前面提到关于毛主席字的问题。“小整风”时上纲到“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我接受不了，在日记中辩解道：

我也从阶级感情出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怎么也想不通。我爱朱德的字，爱郭老的字，爱周恩来的字，这是什么感情？资产阶级感情？字是一种外部表现形式（和内容与形式之形式还不同）。主席著作好，但用什么字写都一样。为什么非得说毛主席的字美呢？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是否我们的领导人什么都

好，好得无与伦比、无刺可挑？是否有一种情绪把领袖人物神化，觉得他们是完美无缺的？我想，这正是个人迷信的一种表现。一个人（无论什么人）都有他成长的环境、条件，都是可理解的，都是可分析的，而不是神化的、完美的、非常人的。我怀疑，在这些同志心目中“一分为二”在领袖人物身上是否适用？

我们爱戴、相信领袖，是因为他的思想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人类解放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正确，所以相信他，而不因为他是“毛泽东”。树立这种观点是有好处的，这是防止个人迷信、防止盲目信任的很重要的思想。斯大林之所以出现错误，没能改正，很重要的一条是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相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字的问题当然不同于思想缺点。只觉得是一种外部表现形式，无关紧要的。美、丑，是有阶级观点的，我同意。但文字，我看（不出）无产阶级的字什么样，资产阶级的字什么样？……我爱端正的、严肃的、清楚的、敦厚的，而不爱细的、歪的、飞的、花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用这种理论过（推）下去，就是说，领袖人物的穿着打扮都是标准的无产阶级化的。谁不喜欢，谁就是资产阶级爱好？

我想好好征求几个懂行的同志的意见，内行的意见。这问题好好讨论也有意思。如果能说服我，我错了，我一定接受。

这段日记使他们如获至宝。此后，“对领袖人物要一分为二”成了我“反动”言论的重中之重。与“小整风”不可同日而语了，谁也不敢碰这一问题，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那种气候下，连我自己也深知难以解脱。直到这个疯狂时代结束，我才得以甩掉这一无限大的政治包袱。

尽管我有很多不合潮流的思想，成为“左派”们用来无限上纲的好材料，我仍认为这是思想认识问题。说我是“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我绝不接受。

我不能再沉默。

这时，电台的群众也从观点不一致进而分化为不同的组织。最早开始折腾的那些人，与社会上的学生红卫兵联系密切，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一些相对平和、相对注意政策、不主动搞过激行为的人组成另一派。被说成“保守派”。汉编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队”，以编辑人员为主。造反派认为“学习队”成分不好、有问题的居多，骂他们“黑乎乎一大片、黑压压一大群”，是“乌鸦队”。“学习队”中虽有人参与“审查”我的日记，但他们也不认为我是“现行反革命”，支持我索回日记。造反派拒不交出日记。我怕他们继续编故事、封锁真相，不得不在无法查对原文的情况下，拼命搜索记忆，写了一篇反驳文字，题目为《我要控诉，我要造反》，澄清事实，以图自我解放。报社的一位同学（造反派成员）帮我修改，我被揪出四五个月，已写不出合乎潮流的文字。我自己刻好蜡版，请报社另一同志用手摇油印机印了多份。

“学习队”顶着压力，在他们的油印刊物《挺进报》上刊出了我的“造反”文章，引起一次不小的派仗。造反派坚持说我是“现行反革命”，“铁证如山”，没有打错。说“乌鸦队”为我翻案，暴露了其“反动本性”。僵持不下时，“学习队”想出了一个办法，建议将日记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继续审查。造反派说不出理由反对，只好交出日记。我居然高升了，从电台内部一个小“反革命”，升级为内蒙古党委不得不过问的人物。那时内蒙古党委还没有大乱，还在尽可能地维持正常工作。

一个月后，内蒙古党委来人了。据说是组织部分管青年工作的人员，两派骨干都到场听了他们的意见。我当然没资格去听对我的“判决”，直到消息透露出来，才知道他们的结论：这不是一部反动日记。日记的主人是一名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但有时思想认识不够正确。对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受到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时有消极、不健康的情绪。“学习队”认为此结论较符合实际，造反派拒不接受，当面同党委的人吵起来，威胁说要去党委大院给他们贴大字报。最后不欢而散。日记仍被造反派扣着。我非常感谢党委的同志在混乱、失衡的形势下仍能实事求是。他们的结论虽未使我改变境遇，但对我精神上的支持是巨大的。我不知他们姓甚名谁，只碰巧看到两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匆匆走进楼门的侧影，更无法表达我由衷的谢意。他们后来是否因我而遭难，就无从知晓了。

从此我成为电台引发派斗的两个人物之一，那一位是局长兼台长。我这个小编辑被抬得和局长一样重要，是因为我和局长的被揪出，关系到造反派的“革命成果”，关系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否“始终正确”——所以要拼命坚持，不惜歪曲事实、以非为是。因此，我和局长大人注定要比其他被揪出的“阶级敌人”挨更多的批斗，压更长的时间，经历更多的曲折。（未完待续）

【蓦然回首】

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

不 平

1972年5月12日，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贴出了一篇署有作者真实姓名、地址的长篇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对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据我所知，大字报贴了半天，早晨6点之前贴出，下午两三点左右被撕去。

它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什么影响。海外研究文化革命中异端思潮比较权威的宋永毅和孙大进两位先生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没有提及它，谭放和赵无眠两位先生所著的《文革大字报精选》同样没有提到它。说起来宋先生也是来自上海，不知他是否知道，是否还记得这篇大字报？有哪一个研究文革中民间思想的会提及这件事？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篇大字报，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提，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太小了。有谁手中保存有这一份大字报的底稿？又有谁传播过它？没有。大字报的标题倒是容易记住的，不过，有几个人会记住文中的论述？有趣的是，近日看遇罗文先生所著的《我家》，才知道其弟遇罗勉当年被关押的理由之一，便是怀疑“真理有阶级性”。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不知道还有谁为这个提法吃过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哲学书，都有着这样一条命题：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过，没有一本著作会提到这篇大字报，会提起这么一个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这一真理（？）的年轻人。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大字

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个原因，假若存在的话，则是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而大字报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正如同彭真提出这个问题，正如同人民日报批判这一个命题，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

从大字报的锋芒来看，谁都可以看出，作者当时的企图是挑起一场大辩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异端思潮的主角。当然谁都同样明白的是，如果这一企图得逞的话，最后的结局无非是在遇罗克，张志新等一串名单上，再加上一位。这是最可能的结局。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希望。作者希望的是，能够产生一个异数。作者当然知道，这一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然而作者也知道，如果谁都默然，那么希望永远是零，而只要有人发声，尽管它是何等的渺茫，但毕竟不是零。然而作者的企图没有得逞，政府对大字报一撕了之，置之不理。这固然在一方面挫败了作者的阴谋，把大字报的影响降到了最小。另一方面却也使作者的生活因大字报所受的干扰被降到了最小。只要想想文革中多少人仅仅因为一封信，一句话，被搞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就此言之，作者似乎有理由对当局表示感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念高三。虽然知道自己是“先天不足”，但对国家大事还是关心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次日，我们学校十几个人，拿了衣服、零钱，（因为是住读学校，这点比较方便。）赶到火车站，要求上京。（是说串联还是什么？忘了。）学校领导派了人来劝说围堵，出人意料的是，火车站方面并不十分反对。故而尽管也有人被劝回了学校，但我们数人还是到了北京。一个同学的哥哥是北大的学生。他安排我们住在一间空的宿舍里。这给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北京，我是数人中大字报抄得最多，最起劲的，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一件事。一次，我们到某大学附中去，那里正在斗黑帮。数十人跪在地上，他们必须把背躬着，头靠近地面，却又不能碰到地面。有的累了，头碰到地面，立刻招来一顿铜头皮带的抽打。其中的一个，还是初中模样的女生，突然抬起头来说：“我不是黑帮。”她所得到的回答，谁都想象得到，只能是一顿抽打，她也只能是又低下头去。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么？在我对文化革命的思考与疑惑中，开始有了否定的因素。

我们学校学生中，资产阶级子弟比较多。文革中，这是学校的一大罪状：阶级路线错误。我们班级的团支部，当然也不例外，一向发展资产阶级子弟比较多。

这时团支部为了显示或者说纠正自己的阶级路线，准备发展我这个一向是白专道路典型的“工人”子弟，表格都已经填了。是晚，我问了父亲的历史情况，第二天，又把父亲告诉我的转给了团支部。于是，这个团员就泡汤了。倒也确实有人说过我傻。不过我一直为之高兴：从此保持了自己的一生清白，从来没参加过任何组织。稍后，参加过“红外围”，不过，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组织。

我当然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去参加革命。于是便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书，包括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五七年鸣放时报上的文章，鲁迅全集，以及马恩列斯毛的一些著作。这些文章给了我大大的启蒙和震撼。使我认识到五七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场冤案，使我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是三十年代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我对于西方的人道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产党要批判我的话，当然可以给我加上种种罪名，但若是说我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则是绝对不确的。我其实是土生土长的。

1967年4、5月间，上面要求讨论教学改革，社会上也有了一些讨论教学改革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我想，这一斗、二批，我都沾不上边，这三改，我是应该参加的。于是，也开始收集各种教改方案，编印毛主席的教改语录，同时也办一份教学改革的刊物，名字是叫《教学改革》还是什么，记不得了，但是对自己所写的《创刊宣言》是很满意的，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出了三、四期，终于发觉这是瞎起劲，也就停了。

随后，开始写长文《伟大的榜样》，至九月完稿，并刻好了蜡纸。但是，毕竟不敢贸然把它印发出去。如果一个人是伟大的，为什么不直接向他学习，去成为伟大的人，而只能忠于他，听从他的指挥呢？为什么要去向林彪学习，去忠于毛泽东，而不是直接向毛泽东学习呢？这篇文章便是提倡向毛泽东学习，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社会，贡献己见，而反对别人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

接着便开始写随感，当然是秘密的。开始是随便写写，提了笔竟就放不下来。十个月下来，到次年7月被扫地出门的时候，竟然也有二十万字了。此时的感觉，一是高兴，一是担忧。高兴者，是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高兴，为自己能有如此系统的思想而高兴。在思想理论上，我敢于面对任何对手。担忧者，是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担忧。谁都知道，那个年代人不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想乃是惹祸的根由，丧命的起因。祸从口出，只要我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观点，那么一

条小命就完结了。我并不怕和我的对手公开论战，并且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实是，有可能一点论战的机会都找不到，便毙命于几个小警察的手里，那太不值了。我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的方针是：要么不为人知，要么为天下人知。为天下人知，是我的目的，为此目的，我愿奉献自己的生命。我最怕的是，偶然的谈吐，被人抓住把柄，白送了一条小命。故而平时我从不谈自己的思想，我怕暴露思想。这时的我，比以前沉默多了。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护朋友。让朋友背上沉重的负担，在自己的良心和自身的前途之间作痛苦的选择，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的看法是，对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既然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何必白白化力气。对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是基于自己的良心。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但是你不去做，心里会感到不安。而且，某些事情的所谓不可为，只是说成功的希望很小。真的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了，事情也就成为可为的了。我想，在中国，思想上和感情上反对文化革命的人是并不少的。这么多的受害者，可以说都是文化革命的反对者。但是他们没有反，因为他们没有武器。而我，既然有了武器，便责无旁贷了。

不管怎样，写了，就是要让它见见世面，不然又何必写？写的本身就是拿生命、拿家庭在赌博。于是，把文章整理了一下，把内容相近的归在一起，并大致按照由弱到强的原则，起个名字，叫《肥田集》。其意为：这里的文章是供批判用的，因此，请让它们发表。所谓发表，其实指的就是大字报，这是当时我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我很想有一个场所，能够把自己的文章一篇篇地贴出去。但是谁都知道，即使是这最原始的手段，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不等我贴完两、三篇，就一定是进监狱甚至上断头台了。监狱和断头台，我倒并不怕。从我开始写时，我就知道它们在等着我。但是想到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或者至少是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才一起步就遭扼杀，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犹豫，在等待。

现在对于鲁迅先生的评论众说纷纭，不过对于我来说，最简单的一点是：没有早年的鲁迅，便没有当年的本人的大字报，也便没有现在这一本《挑战毛泽东》。回想当年捧读先生集子的情形，只觉得热血上冲。虽然我不喜欢先生的翻译，也不大赞成先生的打落水狗，但却是先生激励着我，想为社会做些事。读者可以从这个目录中看到先生对我的影响。

文章中大的板块有三。一是反对个人崇拜，二是论革命，三是从阶级性谈起。大致上可以说，我的文章从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而以争取自由、平等为终结。

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中先是虚晃一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不该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接着就在“然而怎样才能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呢？”下面引足了毛氏语录，进行了实际上的驳斥。文章写于1966年12月17日毛氏“大树特树提法不妥”的语录发表以前。

在《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需要吗？不需要。”

《论革命》是里面的重头文章。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对现实不满”在当时是何等重的罪名，多少人的判决书，处分书中都有这一条罪名。那么《论革命》的第一部份便是为这一罪名平反的。我的观点是：不满是革命的动力，唯有不满，方有革命。当然，文章中所说的是“不满于现状”，是从“满足于现状”和“不满于现状”两者的关系来说的。但“不满于现状”和“对现实不满”不是一回事么？

《论革命》的第二部份是老问题了。歌颂和暴露，打了几十年的官司了，而由毛氏一言九鼎成定局。我的观点很简单：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暴露。

中国人当然也记得，共产党提倡的是螺丝钉精神。而我则提出，革命者就是要努力做大事。

文化革命中提倡的是：斗私批修。则我又针锋相对地主张，革命者要努力地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第五部份则是论说环境与个人的关系。论述对革命者来说，改造环境远比指责个人重要。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的矛头是对着人民日报的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说起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是由官方的断言“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而来的，我只不过加了一个“吗”字和一个“？”，同样地，我很想在“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标语后面加上一个问句：撕得掉吗？当然，我只论及自由、平等而不提及博爱，因为自由、平等是制度的问题，我要争取的是改革这一制度，使得这一制度下人人平等，个个自

由。而博爱更像是人性问题，是属于宣传、提倡的问题。

其中的《影响论》是在看了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后写的。遇先生的文章重点在批判一副对联，我文的要点则是：共产党历来的“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不看出身只看表现”才是正确的政策。文中还引了遇先生的几句话。当时感到敢于论述此问题者，遇君与在下耳，颇以“北遇南×”而自豪。

文章之中，最为得意的是《论自由的阶级性》，此文既成，在思想上便无所畏惧了。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存在着一一种制度：书报检查制度。中国当然不需要书报检查制度，因为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包括出版事业。在共产党统治下，一个审稿制度，便远远胜过了所有的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当时是“没有书报检查制度，胜过书报检查制度”。在当时看来，中国的公有制当然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我以为，在出版方面的公有制，或者说是出版方面共产党的统治制，是绝对应该改变的。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它们是息息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没有出版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区别之点正在这里：出版要涉及到所有制。要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就一定要改变出版界的共产党掌权制，要实行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在文中，我把中国的出版制度称之为：版权集中。实际上只是说：共产党控制了一切舆论阵地。《反对版权集中》便是主张出版自由的。

有两篇文章是涉及两个小人物的。

当时有一个青年，以“何是”为名，在上海人民广场办了一个《东方论坛》，经常贴一些议论时政的文章，也算是热闹了一阵子，结局当然可想而知，取缔，批判。批判是以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报》为主力。论坛的一个观点，是主张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不错。其中的一篇文章，便是替何是打抱不平的。其实，当时何是遭受批判的时候，我还曾匿名给他写了一封信，支着招让他如何去反批判。《工人造反报》曾发表社论，批判《东方论坛》。我的《放？》一文，便是对这篇社论进行反批判的。

其二是当时上海有一个市民，叫吴尘因，给市委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是文艺阵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意思是这样，用词大概还没有这么激烈。当然也遭到了

批判，是《文汇报》还是《工人造反报》，还是两者兼有之？记不清了。我的一篇文章便是为吴鸣冤叫屈的。

不知道这两位先生后来都怎样了。

《后记》乃是沉箱底之作，极大的可能是，在某一步便覆灭，手稿全部被当局抄去，自己也被送上法庭。故这《后记》也可以说是《给检察官的信》，作一下最后的挣扎。其实，也谈不上挣扎，更不抱什么希望，要来的总是要来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手稿被抄走的话，即便是十篇《后记》，即便那法官有十个良心，也不管用。这只能是说姑且为之吧。

我对林彪的简历并不知道很多，不过对他在文化革命中兴起的造神运动反感之极，这也是当时老百姓的普遍感觉。当时曾有一种想法，要亲手把他拉下马。可是他在马上，我和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怎么拉呢？这就首先要铺就一条路，使我可以从这条路上走到他的马前。那么这部文稿可以说就是铺路的，记得当初的文稿最后是两篇批判林彪的文章。大概后来整理的时候没有放进去，现在也找不到了。

在中学的时候，我常被人戴的一顶帽子是：成名成家。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帽子，诸如：不关心政治，不靠拢组织，几乎每学期的品德评语都逃不掉。戴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迷迷糊糊了：也许我确实有着成名成家的思想吧。一直到《肥田集》成，这才重新给自己评审：要是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便绝对不会去写《肥田集》。所谓成名成家的思想，不过是想做些事罢了，于是便自己给自己摘帽了。

这时，正是学校分配的时候。对此，我兴趣不大。因为去农场是大势所趋，也是我的必然归宿。我所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宝贝。我需要找一个志同道合者，需要找一个后继之人。这样，在我为之献身之后，我的思想不至于同时湮灭，它能够继续在世间传播。这不仅仅需要他与我志同道合，还希望他的参与和失败不至于给他的家庭带来太重的负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能尽量减少。有一个好友，数次交谈之后，我便把文稿全盘托出。对于我来说，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愿意随便地暴露思想，因为这既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又会给朋友带来负担。但我既然相信一个人，便没有必要对他隐瞒。况且，要朋友愿意和我共赴危难，当然需要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全部思想。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稿以后，如同众多的百姓，也如同我预期的，推辞了：这太危险。我当时最大的希望便是能

够找到几个同志，能够前赴后继地把这些思想发表出去。在当时的中国，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在这以前，我们全家被赶出了旧居。我们所迁往的新居的原主人不知何处去了，忘记是被撵走了还是死了。这一间二十多点平米的房间被一分为二，一间分配给一家困难户，另一间就照顾了我们。算是看在我家人多的份上，又给了我家人一个阁楼，这里便又成了我的书房。学校的老师照例地完成例行公事，上门家访，催着大家早去农场。我也很干脆，给我十天时间。这样，就可以省得老师三天两头地跑。其实，多赖上几天对我根本是无意义的事，我既不可能，也没想过要赖着不去。最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时正是我朋友看我稿件的时候，我需要一点时间。

就这样，抱着自己的思想，抱着一大堆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的文字，抱着一种无奈，抱着一种期待，我到了农场。

我当然充分认识到自己挑战的艰巨和危险，于是便整理旧稿，以便留一份于深山，在承受打击之后，也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有个初中的同学，是极要好的朋友，初中毕业后去了新疆。记不确切是什么时候，在他回沪探亲时，我把考虑多日的决定告诉了他：能否在他那里放些文稿。我有种感觉，新疆应该是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朋友婉拒了。

还记得 1969 年的春节，我早早地在年初四就回到了农场。农场里寥寥无人，出工也是摆个样子，而我则有比平时更多的自由来整理旧稿。还记得农场里开会的时候，我经常浮想联翩，想象着一辆吉普车从外面开来，停在了礼堂的门口，从车上下下来两个警察，一直朝我走来。因为我知道尽管我自己是如何的谨慎，却完全有可能因为一些意料不到的偶然因素而使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这种浮想，也成了我当时的消遣之一。

1971 年 4、5 月间，我突然想到了毛泽东的死。他已经垂垂老矣。我的文章是冲着毛泽东来的。要是毛泽东死了，我再去找谁论争呢？而且我希望，要说一个人的错，就要趁他活着的时候说。等到他死了，再说他这个错那个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知道要让自己的全部文稿发表出去，乃属痴心妄想，但我至少想让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或者说，让自己的主要思想尽量多地发表出去。于是我便整理旧稿，选出若干。该年 9 月发生林彪事件后，又写了几篇。总共是十

二篇，名字仍然叫《肥田集》，便准备孤注一掷，向不归路起程了。文稿的目录如下：

- 1.理是有阶级性的吗？
- 2.告广大无产阶级书
--- 《肥田集》前言
- 3.鲁迅论创作
- 4.放？
- 5.评《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 6.影响论
- 7.论个人崇拜
- 8.论自由的阶级性
- 9.马克思论出版自由
- 10.林彪死后感
- 11.林彪死后又感
- 12.林彪死后感之三

这时，我的思想更清楚了。套一句毛泽东的话，中国的大事有千件万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论自由。我对自己的定位便是：我是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对建国方略，经济决策之类的大问题，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见解，但是，我愿意作一个马前卒，为争取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而贡献自己。共产党的统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网。但是网有网的特性，任何一个网都是可以戳破的。所需要的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锥子。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当然知道是凶多吉少，甚至是有凶无吉，但是我不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也许这只是千万分之一，亿亿分之一，我愿意一试。

文章的安排是这样的。选择一篇兼有哲学味和政治味的文章作为头炮，可进可退，进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说这只是对一个哲学问题想不通。大字报上的第一句话是马克思的语录：“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这，可以说是我毕生的信念。而且从今天看来，这比起若干年以后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要深刻得多。作一个比喻的话，后者是反对个人崇拜，前者则是争取自由平等。其实这里引用的只是马克思的半句话。记得马克思的后半句是：“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这实在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忘了出处。

社论宣布“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其本质是说：无产阶级所说的就是真理，才是真理。而我的大字报想说明的是：真理不是阶级说了算的，真理是争论出来的。当然大字报对这一点没有阐述得很清楚，是功力不到家吧。不过反过来，这是否也是大字报贴出以后悲剧没有上身的原因之一呢？

第二篇文章由鲁迅语录组成。既是用鲁迅语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自己对鲁迅思想的一点体会。因为是鲁迅语录组成，可以使当局要下手却又难以下手。第三篇文章是“捍卫”党的政策，是对上海的《工人造反报》一篇社论的批判，批判它的“反毛泽东思想”。后面的文章，便主要是批判毛泽东，中共政策，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文章了。

该年年底，农场第一次有了上调。前面一次，抽调过一些中学教师，基本条件是成份好，和广大农场职工，和我没有关系。这一次的上调，可是成千上万农场职工翘首盼望，梦寐以求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要不要争取上调？如果我争取的话，虽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希望还是很大的。一是我在队里的印象、关系比较好。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庭条件好：我的两个弟弟都在一片红的时候去了农村，家里全农无工。

但是我怕上调。我是准备好去贴大字报，与当局较量的。对于当局来说，市区的工人肯定比农场的职工对它更具威胁性，因而前者也就容易招来当局更严厉的报复。一个农场职工，本身已经和关监狱相差不是很远了，而且当局也容易控制，使其不到市区来闹事，太严厉的报复便显得没有必要了。考虑之下，我作出了决定：不报名参加上调。当时整个农场系统，除了当了官，走不掉，只能表态扎根农场的以外，没有报名参加上调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还得对社会，对朋友，对家庭给出解释：为什么不报名参加上调？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怪人，一个不正常的人。要是我说我热爱农场，要扎根农场闹革命，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当时上调还有一部分南京的名额。我便说，我怕万一上调后到南京去，因为家里需要我。

1972年5月12日。事前，我采取了三窟政策。把自己的文稿存放在两个朋友处。朋友说：“我劝你不要这样干。你一定要干，我也没办法。这一点忙，我还是能帮的。”我不敢企求更多的了。一个朋友处存的是基本文稿，大致上是不准备去动的，主要是早期的一些稿子。一个朋友处放的是取用稿，也就是本书中的十几篇文章。我自己处，只剩下一篇大字报底稿，它便被放在农场宿舍的衣箱里。衣箱没上锁，底稿在最上面。前一日买好了该日上午回崇明的船票。当局肯定会来找我的，我希望当局能够到农场来找我。给家里带来麻烦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给家里的麻烦能减到最少，我希望尽量少一点惊动家里和邻居。事发之后，当局没有来抄过我的家，倒是我的父亲把能找到的有我笔迹的东西撕了个精光。

当日清晨，我给家里留了一份告别父母书，或者，也可以说是遗书吧。大意是说，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就请弟妹照顾好父母。大字报的地点选在人民广场，和平电影院的对面，科普画廊的下面。大字报的末尾，署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和农场地址。大字报一共有二十二张。为了减少张贴的时间和张贴时被抓的可能性，事先，我已把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张贴的时间，减少在贴的时候就被逮走的可能性。事后，一次碰到一个当日看过我大字报的人。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页与页都分不大清，看起来不方便。这使我增加了一点经验，以后把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的时候，页与页之间还应该再黏点白纸。而且，大字报贴得太低，只有前面的人看得见，效果不好。

我5点多就出了门。当日天气很好，有点雾，周围人不太多。贴大字报很顺利。有几个人过来看，还有人好奇地问我问题，但只是好奇，并不尖锐。贴大字报之前，把大字报的一份抄稿，丢进了邮筒。这是寄往文汇报社作为投稿的。投稿当然是假的，根本就不寄希望于发表，不过是向当局提供一份材料，当局若要批判我的话，便可以以此为据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未收到过文汇报只字的回应。这倒也不是意料之外的。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份稿件当时就被扔进了废纸篓么？还是被保存在什么地方呢？它现在还在世上么？

我想象不到竟会这样地顺利，竟还会容我从容地走开，赶紧回家。家里人尚未起身，“遗书”还在桌上，连忙把它扔了。得知有个朋友昨天来访，未遇。很快出门。马路上逛了一些时候，八九点钟时，乘车经过贴大字报的地方，去遥观了一下大字报。大字报还在那里，也有不少看的人，心里自然高兴。然后去访昨

天未遇的朋友。原来我的计划是贴好大字报直接回农场，不访问任何人的，不想给朋友带来连累，实际上这次回上海便没有访问过任何朋友。

我可以不去拜访别人，但是我不能阻止别人来拜访我。实际上，就在我贴大字报的前一天，就有同学兼队友从农场回来来拜访过我。我们随便聊聊，一起看了场电影。事后，队里向这位队友问当时情况。他双手一摊：“我一点都不知情，他和平时一模一样。”他说的是事实。

家里告诉我的这一位来访而未遇的朋友在上海工作，也算是交情非浅的，想想也应该去看他一次，这次不去的话，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况且因为他在上海工作，当局不一定能查出我的往访，不一定会给他带来不便，便改变了计划。在朋友家里，告诉了朋友大字报的事，朋友对时局也有同感，竟然感到比平时更为投机。正所谓：国事如晦，忧愤难言，寸心谁知，不禁涕泪。于是进一步改变计划，多坐了一会，准备下午回农场。等我赶到码头，船已经开了。我从来没有乘过下午的船，居然把开船的时间搞错了。

这下实在是狼狈。现在是有家难归了，到什么地方去流浪，去过夜呢？百般无奈，我想起了火车站。不是有很多人火车票没买到，走不了，在车站过夜的吗？近午夜，到了北站，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想休息一会。我的装束立刻引起了值勤公安的注意：年纪轻轻的上海人，身边只有一个书包，而且没有车票。我对公安说，我是与家里吵了架，到这里来过夜的。公安问我家里地址，我自然不肯说，要证件，也没有，于是公安便把我带到了楼上的一间大房间。里面人很多很杂，大多是无身份者，也没人管。我想这不是一个机会吗？走了算了，便奔了下来。自然这是我犯傻的一个地方，立刻就有公安在楼梯上把我抓住了。这下，公安比刚才严厉多了。抄了我的身，问起话来也声色俱厉。我也如实交代：我贴了大字报。

不多时，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黄浦分局。三、四个人提审了我。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有什么动机？答道没什么动机，想不通。实在问不出什么，便把我扔进了一间囚房。狱卒说：“他妈的，吃饱了饭不好好地干活，专干坏事。”这时，大概已经是3、4点钟了吧。囚房很小，里面有七、八个人。一见有新的囚友进来，都起来争着问：什么事进来的？知道我是为贴大字报进来的，便说：这个人是生了脑膜炎的，也就不感兴趣了。送来了一碗牢饭，好像也没吃，胡乱地熬了

几个小时。也没有什么紧张，这些本来就是意料中事。不过就是想想家里不知怎么了，后悔白天没能赶回农场，再就是一种新鲜感，当然也在想下一步怎么办。

早晨 8、9 点，我被转移到一个单人小间。里面有一块板，可以睡觉。要上厕所的话，敲敲门，会有公安带我去。也不再吃牢饭了，由公安到食堂去买了给我。记得开始时一个公安还问过我：“你要吃什么？”我既不知道他们的菜单，况且也无所谓，以后也就不问我了，只随便买一点给我。因为我没有带牙刷毛巾，故只能乘上厕所的时候漱漱口抹把脸。也没有人再审我。感觉上看我的公安（当然不是专职的，也许隔壁就是值班室，记不清了）还蛮和善的。一次一个公安还告诉我，为了我的事，我妈还赶到农场去了。这使我大为悲哀，没想到，其实也应该想到，为了我的事，让母亲如此担惊受怕，为我奔走。在里面哭了一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记住的一次哭。

16 日中午，农场的支部书记把我领了出来。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手续，让我把饭费交了。我注意到，我这次算是“留置”。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回事，以前只知道有“拘留”。他们似乎忘了第一天的牢饭，我提醒了他们，“算了，算了。”他们把手一挥，也就算了。过了半年，我收到公安局的账单，又让我去交第一天的牢饭钱，我又去把它补交了。

支部书记把我带到家中，让我与家人小聚，然后就带我直接回农场。路上说了一些以后要好好学习，有事找组织，不要乱来之类的话。农场里，已经是谣言满天，组织特务集团，叛国投敌之类的都有。这下，全因我的出现而平息了。表面上风平浪静，甚至没人找我谈话。一回来，头头们问我要了大字报的底稿，以后便没有下文了。而我则态度坦然，劳动依然。有些农友对我避而远之，背后议论纷纷，也有一些，问问我当时经过，我也就随便谈谈。事实上，谁都知道，事情没有了结，当局不会这么放过我的。谁都想知道，这件事的结果会是怎样。有女生告诉我，出事当天，我母亲以为我回农场了，到农场来找我，没有找到，晚上就睡在她们宿舍。半夜我母亲叫着我的名字惊醒过来，把宿舍里其他人都吵醒了。我母亲对她们连声说：“妹妹，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吵醒了。”这使我很悲哀。

当局不找我，我找当局。8 月，正是农闲时光。我找到连队，试探性地要求请假探亲，当然被拒绝了。

其后，我突然发觉，几个原先关系和我不错的，即使我贴了大字报以后也并不和我怎么生分的，突然开始避开我了。我有点纳闷。几经调查，居然也给我搞清楚，我班上有个职工，平时也不和我怎么样。她有个儿子，十岁左右，告诉他学校的老师说：我平时给他吃糖，让他到林带去贴东西。稍有头脑的人，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事几乎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我是要到上海市中心去贴大字报，要造成影响的，怎么会到林带去贴？林带里都不大有人去，要是雨打了，风吹了，我不是白贴了？我是喜欢自己干，署真名的，又怎么会让孩子去干，还要给他吃糖？即使退一万步，我真想去贴什么东西，我找个没人注意到的时候自己去贴一下，不也比引诱孩子，让他去贴安全多了。须知我那时的行动实在没有受到限制，除了回上海，也没有必要受限制。然而，村妇们却信以为真了。

在我贴了大字报以后，很多人以为我思想反动，思想复杂，而有“人不可貌相”之叹。这下，我更是人格卑劣，成了教唆犯了。而且谣言四面流传，已经铺天盖地了，只瞒着我一个人。我当然不甘心，我得采取行动，我不能任凭谣言流传。我先找了连队领导，想辩解一番。他们根本就不睬我，说正在进行调查。于是，我便在第二天白天，连队的中心——大操场，找了孩子的母亲，要她把事情说说清楚。而她则说：你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数。我们两人扭打了起来，当然也立刻被拉开了。作为我，从来没和人打过架，和一个女的打架更是有损自己的形象，不过是想借此为自己作一个辩白。

第二天，我贴出了大字报。

大字报

自从昨天打架事件发生以后，连部找我谈了话，要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并说可写大字报申辩。在此，写大字报辟谣如下：

我班职工某某之子，系二年级学生。无中生有，告我经常给他吃糖。并于某星期日，将他拉进我宿舍，唆使他到林带去贴字条。其它内容尚不得知。

谣言开始时，我尚蒙于鼓中。直到半月之后，才开始知道。以致我队之人，皆视我为极反动，极卑劣之小人。如此重大之罪名，不得不予以辟谣。

我于5月16日回队之后,除了7月5日一天休假,8月13日半天病假以外,天天出工。每次出工,与班里同志同出同归,并无迟到早退之事。若要进行教唆,除非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我想这时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就请我室同志,同排宿舍的同志,我队的同志,回忆回忆,可曾看见我拉他进宿舍,或在宿舍内与之交谈。好在时值夏天,我宿舍门窗一直开着的。而且我宿舍在中排,前后有人,难道竟会无人看见?

说我给他吃糖,更是莫明其妙。我想,若在上海,还较复杂。我队之事,有目共睹。我若给他吃糖,也不会只有一次。就请他说说,我给他吃过几次糖?在哪里?在操场,还是在宿舍?在窗口,还是在室内?我队的同志,有谁看见过我给他吃糖的,可以站出来揭发。

我和此劣童仅只发生过一次接触。在6月6日早稻插秧最后一天,劣童与他弟弟赶到田里,指着我穷骂:“xxx,在上海贴大字报,关了两天半,xxx(我队支书)保出来,不然要饿死在里面。”我当时并未理睬,事后曾告他母亲,以后再这样,我也要客气的。我不知道事情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若是在此之前,为何如此谩骂之时,竟会只字不提此事?若是在此之后,我为什么又要去找一个骂过我的劣童去干此事?莫非以为他骂过我就不会揭发我了么?

.....

我想,我回队之后,一举一动,我队群众,有目共睹。家属宿舍,基本不去。农机站更是半步不走。足迹所至,屈指可数。如此做人,还会有罪名上身,是做梦未曾想到的事。

说到底,即使我要做此事,我为什么自己不做而要叫此劣童为之?是我想做,又怕了?还是叫他做保险,不容易暴露,不容易拆穿?这中间的道理,我日思夜

想，实在悟不出。要请我队头脑清醒一些，了解到阶级斗争复杂性的同志替我分析一下。

事情终久会弄清楚的，我×××是怎样一个人，终究会被群众了解的。有些事情，可能使得有些人吃惊了。但是我做事光明正大，决不至于诬陷连累到第二人，决不至于干一些卑鄙的勾当，什么给小孩吃些糖，叫他去干坏事。却是可以声明在此的。

怎样的行为，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历史会做出结论的。

我的大字报招来了两篇大字报。一篇是《拳头吓唬谁？》，署名“几个革命群众”，另一篇叫《×××已吓了》，署名“击×”。我当然不甘示弱，又贴出了小字报。其中说：

几个革命群众自然是眼睛雪亮的，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这一法宝在手。然而，分析了这么多，竟仅仅是“提以下的见解”，竟没能断言确有此事，也是很令人遗憾的。我进行辟谣，自然是掩盖事实。那么诸位就将事实揭出来呀。两篇大字报，揭出了多少事实呢？

自然像击×这样革命群众的大字报，终于没有说他们看到我和劣童密谈，或者我给他吃糖。说明他们到底还是比较光明正大的，到底不愧为什么中生中的优等货，还是值得劣童学习的。

最后还想“公开指点”一下诸位。像这种废话连篇的大字报，有什么写的必要呢？还是回去再仔细想想，可有什么看到的听到的，可以证明劣童是揭发而不是造谣的。这才是劣童真正需要的。一个人造谣也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劣童，我也很感惋惜，现在已经连红小兵都当不成了。到了将来有一天

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或许会进行一下阶级分析，知道是谁害了他。

原先我以为，大字报一出，应能澄清一些事实，我的事也就完了。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还有人反驳我的大字报，真使我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应该说是中国之怪，无奇不有。我便改变了策略，准备打持久战，坚决奉陪到底。他们是可以把这作为工作的，但是我不行，我得坚持出工。考虑到时间和精力上的不利之处，我便改写小字报。反正读者有限，两者的效果区别不是很大。我又没想到的是：战斗就这么结束了，成了一场速决战。整个过程便是这样，几个小丑跳了出来，讨了一顿骂，又退了回去。我想他们一定在庆幸：幸好没有署上真名，要不，太狼狈了。而我，则达到了辟谣的目的。他们的大字报更帮了我的忙。

对于党支部在这中间的作用，是不是怂恿他们或指使他们写的，后来又让他们停的，只能说估计情况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想，党支部以及农场党委，是密切注意着这件事的。后来，党委调查的结果大概发觉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谎言，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少对我是这样。在这过程中，我提供给当局的，就是这两份大小字报。我想它们还是起了作用的。自始至终没有人找我调查过，问过我一句话。想想真是可笑，一个十岁的孩子，大约是想成为英雄或重新加入红小兵吧（当时他已经被开除了），随便撒了一个谎。一大堆成年人居然被牵着鼻子走了两个月。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悲剧。人们只知道阶级斗争，除此以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既不懂情，也不懂理，更不懂逻辑。

这一个小事件把党支部（是不是该说党委，或者当局？）逼到了墙角。这一个小事件是结束了，但是这一结局令党支部太不满意了。于是党支部开始转到我的原始大字报上来。当然更可能的是由于市里的指示。连队召开了一次辩论会。我当然得对付，不过也没有太认真，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对手。你辩我答，记不起有什么激烈的场面，也记不起有什么高昂的口号。二、三天后，连里又召开了一次批判会。所谓批判会，我当然是不能争辩的。于是我便端了一个小凳子去，坐在那里听，其实大概也没有听，会开好了便走。这种批判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把上海当战场，把农场当宿舍的。这些插曲只能算是几个小梦吧，我会认真么？不过我还能记得一些批判者严肃而认真的模样，不禁令人哑然。这些批判者其实也就是前面两份大字报的作者。他们希望在这中间为自己上调创造

一些有利的条件。劣童事件上捞不到，就到大字报上来捞。要不是我的大字报，这些个辩论者、批判者，恐怕八辈子也想不到“真理是否有阶级性”这一个问题。可是时机一到，一下子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有资格对别人批判、鞭挞了。可惜天不作美，算盘打错了。一个天大的机会，竟然就这么一次辩论会一次批判会就匆匆收场了。尽管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但我想，他们的忠心还是得到了回报的。

再随后，我得到了内部消息，市委对我作了三条指示，最重要的一条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其它两条记不清了。至此，大字报事件落下了帷幕。

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等待着的没来，没想到的却来了。作者原先预期着的，是批斗、逮捕、公审，甚至……可实际到来的，却是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

总的来说，当局对我的处理是不严重的，或者可以说是没什么处理。没有抄过我的家，也没有逼着我做检查。1972年的上调，我当然不抱奢望。1973年也没让我上调，我想多数是当时支书的一人所为，不一定是更高当局的意思。最后也终于让我乘上了末班车。后来的入学、出国，都没有受到影响。确切些说，没有受大字报事件的影响。这是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自己。

共产党向来是以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而闻名的。而今对于我这个公开跳出来的分子，居然采取“不接招”的战术，实在令人捉摸不透。是出于对一个农场青年的宽恕？是感到接招可能会被动？还是决策者中有人赞同我的观点？不过至少说明共产党里温和派的存在。我倒是很想知道高层，或者说中层在这一大字报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很希望能有知情者告诉我一点内幕。对于我来说，大字报贴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像一只大雁飞来了，又飞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点音响。大学期间，时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领导知道这件事吗？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档案中是否有这一事件的记载。

还有一个插曲值得提一下。就在我的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了张恩慈先生的一本书，书中便主张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张先生的大名和他的主张的罢。我正好看到了那本书。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赐良机，又给了我一丝希望可以挑起论战。我便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张恩慈先生：

正当全国掀起学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高潮时，先生所著的《认识与真理》能得以再版，确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好事。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自然会对广大群众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帮助，便是略有不当之处也可以引起争论，明确真理。

先生自然是准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所谓“不当之处欢迎读者同志们批评指出”只不过是谦虚之词。先生也早知道“不当之处”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会有人来反对先生的观点的，那么本人便是一个。

本人正好在先生的著作再版时投了一稿给文汇报，阐明了本人对真理的阶级性的看法。自然，本人是主张真理无阶级性的。而且，本人也不想随风倒，就是说，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本人的观点时，是不大准备放弃的。

也无所谓“不当之处”，不过就是愿意同先生辩论辩论。本人信奉的是两条真理：“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真理越辩越明。”

若是先生认为本人的文字不值一驳，那么，诚然先生完全可以将此信丢入废纸篓去。

若是先生认为必须同错误作斗争，这是先生的义务，那么就请先生进行一下反驳，进行一下辩论。无论是私下的交换意见还是公开的辩论，在我是都无不可的。但只是本人并无发表本人意见的场所，上次的投稿即是一个明证。那么若是先生愿意公开辩论呢，就请将本人的文字与先生反驳的文字一起发表。因为据我所知，鲁迅先生是颇喜欢发表对方的文字这一无产阶级的手法的。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自然先生也可以诸如进行大批判等等，只要先生认为这样就可以证明真理是

在先生方面，就请便吧。

以上为前言，下面陈述我对先生著作中新加《客观真理与阶级性》一节的意见。

(下略)

但是，我仍然未能如愿。

信大约是在8月发出的。数月之后，大约在12月份，信被退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我只知道，这数月之中，这封信去过北京人民出版社，去过朝内人民出版社，曾经被拆过，至于还去过什么地方，经了何人之手，是否受到过什么批示，我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回想起来，回崇明后，自己并没有机会回上海，一直到国庆节以后。当时应该是有人告诉我张先生书的出版以及他的这一观点，而我再托人去买了来的。不过，详情记不清了。

记得在大字报之后，一位朋友前来看望，郑重地向我指出，你这是在玩火自焚。我当然不会与他争执，他是好意。况且在旁人看来，自己也确实像是在玩火自焚。不过在心底里，我是在回答：你说我玩火是说对了，不过何以就一定自焚呢？我需要的是把这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焚毁。

当局挫败了我的阴谋，没有让“真理有阶级性吗？”成为一个社会争论的热点，当然是我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当局也还谈不上对我迫害，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对我很宽容了，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节录自不平《挑战毛泽东》前言。此书由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读者可登陆BEAUTHOR.COM以阅全书。

【文革遗产研究】

自我否定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四

顾 土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经历过各种钦定的历史、哲学、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强力灌输。在全国学哲学的浪潮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才知道了黑格尔，又知道了否定之否定。我在中学时，那些政治课老师和爱好学哲学、学辩证法的学生，最爱说的就是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可谁也没想过，我们当时身处的文革，就是一场否定之否定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推动，促使文革不断运行，直至自我终结。

—

文革的现实政治状态似乎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形而下的体现。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宣告：“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那时我正在乡村落户务农，与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思想基本与党中央一致，但听了这句话之后，却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刘少奇和林彪之被揪出，是文革的伟大胜利，还有道理可言，因为他们在文革前已经重权在握，可是“四人帮”纯粹就是文革的产物，没有文革根本就不可能有“四人帮”登台！“四人帮”的倒台怎么能说是文革的胜利呢？

文革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但这场大的运动实际上又由一个个运动组合起来，或者叫连贯而成的，大运动里再含运动，一个套着一个。整个文革不妨称为运动的大杂烩。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目的都是否定历史，文革就是对文革前的否定，文革期间，上一个运动大多也被下一次运动所否定，此一阶段否定前一阶段是常态，而文革结束之日，恰恰正是整个文革被否定之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的呼声压倒一切，最近几年，不能一概否定文革和肯定文革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其实，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否定文革，恰恰来自文革本身，也就是说文革自身早已彻底否定了文革。自我否定，正是文革的典型特征。

文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摧毁，还是思想意识的颠覆，最终目的都是对人的打倒和清洗。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极致，动因也是要将所谓明的暗的、

新的老的阶级敌人彻底铲除。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关于文革的宗旨表达非常明确：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以，文革中每一场运动对上一场运动的否定，也显示在对人物的否定中。事情是人完成的，否定人也等于否定事，在那些人被打倒后，他们所做的事也都会受到激烈批判，一律否定，这也是文革的特点。每次运动，就是打倒一批人、推举一批人，那些红起来的人物，以后再被打倒批臭，一次又一次，以致形成了一种规律。当所有人都被打倒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被否定。文革告终，自我否定即成定局，想不否定都不可能。

二

1964年夏季，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是文革的序曲。此前，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已经将文革前的十五年文艺彻底否定：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此后，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批判杨献珍；196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影片《林家铺子》的文章；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人民日报转载；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开始批判翦伯赞；1966年2月，人民日报批判历史剧《谢瑶环》……所有这些人和作品的作者都是1949年以来哲学、历史学、文学、戏剧方面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标志着对中共执政以来的文化成就的全盘否定。1966年2月，根据毛泽东授意，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纪要，纪要在毛泽东修改之后又由中共中央批转，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面对这一系列批判，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除康生外，领导初期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

成员相继被打倒。这是文革的第一次自我否定。

接着，中共中央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为康生，以后又增添了陶铸，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人是组员。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决定向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补选陶铸、陈伯达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陶铸还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1966年7月，毛泽东连续批评工作组，认为起的是坏作用，中共中央又决定撤出工作组；1967年1月，陶铸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变成了打倒对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撤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近一半遭到清洗；在文革初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不但被打倒，还受到全国上下持续疯狂的大批判，直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又是一次自我否定。其中，陶铸完全是因文革兴起而调入北京最高当局的核心，一跃而成位居第四的显赫人物，其任务就是替代刘邓参与文革的决策和指挥，谁料，也是忽然间，一下子又沦为“刘邓陶”，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他的倒台，自我否定的色彩比刘邓更浓重。兴也文革，毁也文革，陶铸可谓第一位要人。

1965年后的三年时间里，有四拨人是典型的起而又倒的人物，他们代表着文革初期的不同势力。

一拨是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林杰、穆欣等），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在政治舞台红极一时，但在1967年8月以后，王、关、戚等相继被打倒，身陷囹圄。尽管他们的经历、资历、背景与登上政治舞台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兴也文革，毁也文革，这一特点却是一致的。

王、关、戚的被打倒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领导层内部的否定，而另外三拨人的被清洗，则是对文革初期社会活跃分子的实际否定。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即所谓的首都高校五大领袖，这五人因率群众造反而成为名人，有的位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有的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或常委。而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都退出社会视野，七十年代初，又都被隔离审查，也等于被打倒。

“联动”分子多为高级干部子弟，是受到毛泽东最早肯定的红卫兵。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忽然说他们是反动组织；《红旗》杂志同年第3期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称联动是“反革命组织”，一批“联动”分子因此被逮捕。

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里面开始批判所谓反革命组织“五一六”。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各地还设置了专门机构，清查“五一六”分子。被清查的“五一六”分子大多是文革初期各地各机关、工厂、学校里比较活跃的造反派。

从陶铸的被打倒、王关戚等中央文革小组红人的下狱，到五大领袖的被审查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从上而下的人与事的彻底否定。随后，陈伯达的被隔离审查、林彪身亡以及批林运动的发动，则是对文革前半期的人与事的全面否定。

陈伯达完全是因为文革而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位居第五，并且担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任，起码在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人物。但是，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位文革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却被隔离审查，而且被定为“五一六”的操纵者。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陈伯达的罪状主要是，具有反动的历史，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阴谋篡权。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性，说他长期从事反共活动，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也是因为文革才身居一人之上，下万人之上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选举的政治局常委里，林彪位列第二，是仅存的副主席。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议》，称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在大会通过

的党章中作为唯一接班人被写入总纲；林彪作为文革公认的副统帅，在文革初期的狂热个人崇拜中还能与毛泽东并列而受到“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万众祝福。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尊贵位置，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文革前半期的最大政治果实。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中共和军内炙手可热的地位，也与文革有着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文革，他们才进入政治局，正是因为文革，他们才掌控了中央军委办事组。可是，这样的政治果实和唯一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13日突然“走向反面”。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是“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反省，彻底交代。12月开始，中共中央又不断印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陈、黄、吴、李、邱等人的党籍，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其中还有一个李雪峰。1966年6月他曾取代被打倒的彭真，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文革初期受重用，后来又被否定的人物。1974年开始，林彪又与相隔两千多年的孔子扯在一起，被认定为“孔孟之徒”，遭到新一轮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猛烈批判，即闻名中外的“批林批孔”运动。

说文革不能只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逝世时，文革并没有结束。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根据毛的提议，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可以视为毛泽东认定的接班人之一。毛之后的文革，他是最高领导人。直至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才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并且宣称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对文革的表述，基本沿用了毛泽东的说法。然而正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定了文革。1976年10月，他与另一个极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联手，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毛泽东最信任的思想家张春桥、毛泽东最欣赏的笔杆子姚文元、毛泽东最看重的造反派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与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相比，“四人帮”的青云直上与文革更具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文革前，除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外，其他人的职务都很低，江青尽管是毛泽东夫人，但公开职务也不过是个处长。没有文革，“四人帮”从何而来？摧毁了文革最重要的政治产物“四人帮”，正是对文革的否定，而且是对毛泽东

意愿的反动。华国锋本人因文革而被选定为接班人，逮捕“四人帮”的行动起码证明他并非毛泽东期待的那种接班人，这也是对文革的否定。

三

在社会发展中，否定是一种必然。所谓否定，一种是彻底否定，比如二战后德国新政权对纳粹时代的否定，1949年后中共执政的新中国对国民党执政时代的否定；一种是部分否定，比如美国200多年来的历史，虽说始终不断在否定自己，但立国的根本从未改变。

文革对中共领导人的否定，和对党外长期合作者的否定，等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奋斗历史，难道是一大群叛徒、特务、工贼、反革命、国民党分子与毛泽东联手创建了新中国？文革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历史的彻底否定，也等于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党内多数领导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了十几年的“资本主义”，最高统治者首先难辞其咎。没有他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哪来的这么多“走资派”？

在文革中的那些自我否定，更是一种彻底否定。至1977年为止，所有因文革而活跃而起家而发达而位至显要的人，一概被文革所打倒。文革是造反，而所有积极参与造反的人在文革中一律被清洗，被镇压，被审查。文革是大批判，但所有从事大批判的知名人物，均先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或者称之为“御用写作班子”。中央文革是领导文革的主要机构，因文革而生，但是，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生命在文革中无不以阶下囚而告终。只有康生死得早才逃过牢狱之灾，但也盖棺未能论定，仍然遭到了“撤销悼词”和鞭尸式的批判。文革是要揪出那些“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选拔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是，被选中的接班人却接连遭到灭顶之灾。刘少奇虽然被清除了，可是选中的林彪最终被定下的罪名并不亚于刘少奇，对林彪的大批判运动还甚于刘少奇。王洪文是从文革中杀将出来的人物中爬得最高的，但他却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说，最革命的文革却一手培育出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还让这个分子一步登天。华国锋是因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被毛泽东最后钦定的接班人之一，却推翻了文革最重要的政治结果，将毛泽东最亲信的人投进监狱。可见他也背离了毛泽东，等于否定了自己。

文革自我否定的特点就是理论上、话语上坚决肯定，而事实上、具体结果上却彻底否定。文革肯定造反，却对造反派和具体的造反人物否定；对中央文革小组肯定，却对小组的主要成员否定；对九大思想和文革前期历史肯定，却对九大结果和文革前期主要政治人物否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领导文革前期运动的主要人物，实际却成了“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而且追随王明、刘少奇一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前期的文革究竟是个什么文革？林彪被树为紧跟毛泽东的典范，是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最后却成了“孔孟之徒”，是一向反对毛泽东的野心家、阴谋家，还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可见比刘少奇更坏。那么，文革前半部分是不是比文革以前还不如？华国锋继承毛泽东遗志，坚决肯定文革，信誓旦旦地宣布以后还要多次进行这样的运动，但文革的主要政治产物却被他亲手扼杀，他领导的文革结尾又算是个什么结尾？

四

依照当年否定之否定的说法，社会发展的否定应该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也就是说，每一次否定之后都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并非回到了起点。但是，文革的每次自我否定无一不是转回到了起点，甚至还落到起点以下，可谓白转了一圈。文革的最终目的是揭露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没料到，上来的“左派”却一个接一个都成了赫鲁晓夫，尤其是靠着打倒了赫鲁晓夫式人物而登台的那些人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本来陈伯达没有那么大的声望，王、关、戚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文革制造出他们的声名与权威，最后又被打倒，回归于无。林彪本来还不是接班人，全国人民从来都没有集体祝福过林副主席，文革创造出来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草案），最后又被批倒批臭，连文革前的声誉都被扫除一净，连打江山时的赫赫战功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四人帮”原来什么也不是，文革让他们如日中天，最后又落入尘埃。如此事例，文革中举不胜举。否定到最后一结算，文革的成果恰恰就是培育出、制造出、发明出一大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自我否定，经过文革的多年锻造，终于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直影响到后来。

【闲读偶记】

两位主席夫人与一个椰子的故事

胡庄子

《天津老年时报》2009年2月20日刊登一篇文章：《江青在海南鹿回头宾馆》，此文颇受关注，被一些报刊转载。先看看全文：

20世纪末，我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的几位同志赴海南考察，省政府陪同考察的同志讲了江青在海南鹿回头宾馆的故事，今年初我去海南旅游，当地导游又讲了同一个故事，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诙谐幽默。

上个世纪60年代，江青到海南岛游玩，住在三亚市鹿回头宾馆。宾馆三面临海，院内遍布椰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一天早晨，江青独自在宾馆院内的椰林散步，步履轻盈，悠然自在。走着走着，树上突然掉下一个椰子，正砸在江青的脚面上，疼得她坐在地上，好一会儿才勉强站起来，遛早的兴致一扫而光。她忍着痛又气又恨地返回宾馆住所，半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女服务员。她问服务员：“宾馆院内这么多椰子树，椰子掉下来砸着人多危险呀！”服务员告诉她：“不必害怕，椰子是有眼的，它不砸好人，专砸坏人。”江青听了更加气急败坏，回到她的住处，立即命令随从人员把宾馆经理叫来。宾馆经理急忙来到江青住处，江青一见他就大发淫威，强令他把宾馆院内的椰子树全部砍掉。

经理回到办公室可犯了大难，砍掉数百棵椰子树不啻是一场浩劫，不砍又无法向江青交代。左思右想，想出一个既不砍树又能闯过江青这一关的两全之策。他让厨师把砸江青的椰子剖开，把椰汁和绞碎的椰肉倒入砂锅，加入可可、牛奶等配料，煲成一碗羹汤，经理亲自送上江青的餐桌。江青一进餐厅，一股异香扑

鼻而来，她美美地把一碗羹汤喝了个净光。她问经理：“这碗汤用什么原料做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汤！”经理告诉她：“这就是用砸你的那个椰子做的。为了给你报仇雪恨，我让厨师剥了它的皮，取它的汁和肉，加入上等配料熬制成的。这个椰子砸了你的脚，只能怨它不长眼，与椰子树无关，宾馆院内那些椰子树是无辜的。”江青听了，无言以对，只得默认倒霉，也无法再坚持把院内椰子树全部砍光了。江青上演的一场闹剧，就这样狼狈收场了。

这则故事，我读后觉得有些眼熟，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

几天后，终于想起来了。文革中，造反派在批判和丑化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文章中，也有类似涉及椰子的段子。于是，翻阅相关资料，很快找到了。抄录如下：

（1960年）“太上皇”（注：指刘少奇）与其“扒手皇后”王光美来到海南风景区鹿回头游览。一日，刘某偕同王光美闲步椰林，欣赏热带风光。突然，不远处一棵成熟的椰子从树上跌落，吓坏了“刘皇后”，当即训斥县委：“椰子打到主席头上怎么得了！”这下忙坏了一些人，当夜出动爬树，将全部椰子不分生熟统统摘除。真是“皇上”漫步椰林，椰子一扫而光。

这段故事摘自上海图书馆《文革风云》编辑部等1967年编印的《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国内外之行罪行录》。大同小异的内容还刊登在首都园林批修联络站编辑的《园林革命》1967年第2期、南京大学红色造反派《农奴戟》编辑部等编印的《阎王出巡》1967年第2期等。

一个椰子，涉及两位主席夫人。也算是奇事。

当然，两件事可能都是实事，也可能都是子虚乌有。特别是前者，情节曲折，显然是经过加工创作了。

存此留念吧。但愿中华大地上多长椰子，不要再生长类似的故事了。

【故纸堆】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

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复印件。

【简讯】

苏联外交官回忆录披露“九一三”事件新细节

舟 人

最近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第十期发表了一篇虽然不长但却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文章：阎明复写的《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文中引述了“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一书中有关“九一三”事件后的现场见闻（当时作者奉命前去现场调查）。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新的细节：

1、“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乘坐的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书中说：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至于这个“被击落”是被谁击落？是蒙古军队还是驻蒙古的苏联军队？从引述文字中看不出来。

2、飞机上发生过枪击。书中说：“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

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

3、事件发生后苏联官方很快就知道了林彪出逃的信息。书中说：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

在阎明复引述的这些文字中，未提到飞机上“黑匣子”的下落。